

凌純聲、中研院民族所與 臺灣人類學的建制化*

何翠萍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退休副研究員

凌純聲先生（1900-1978）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創辦人，是開展臺灣人類學學科建制化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學術研究具有寬廣的時空場域，更跨越考古、歷史、民俗、博物館和文化人類學，海闊天空、精彩絕倫。然而，學界對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建制立足於臺灣的人類學，所論甚少，本文即嘗試彌補此一空白。筆者認為凌的學術格局與其家庭養成、求學經歷、工作閱歷和時代脈絡息息相關。本文將從三個面向來討論：(1) 成長與求學背景、(2) 在大陸時期的民族學生涯經歷、(3) 來臺後創建中研院民族所與民族學博物館的過程。資料來源有三：一是個人書信、出版品，以及他人對凌純聲的論述；二是中研院院史、公文，胡適檔案資料庫、史語所及民族所的書信、公文與影像資料庫；三是訪談，包括筆者訪問其女兒凌曼立，以及民族所博物館多年來進行的人類學家訪談計畫。這些資料所呈現出來的是性格內斂、沈穩、務實、堅毅而謹言慎行的凌純聲，同時也是一位想像力豐富、熱情感性、專業素養十足的學者。他在內斂而又感性，堅毅而又熱情的性格導引下，以其對人類學知識及開闊時空視野的信念，胸懷世界，堅毅地創立了獨立的民族學研究所，既發揚光大了中研院首任院長蔡元培的民族學理念和博物館願景，更奠定人類學在臺灣專業化的學科發展基礎。

關鍵詞：凌純聲，中研院民族所，臺灣人類學，民族學，學術建制

* 投稿日期：2023年1月5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4年8月20日

一、前言

凌純聲先生（1900-1978）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創辦人，是臺灣人類學學科建制化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如此一位開創性人物，為什麼研究其生平經歷之文章如此之少？不但不見於他工作17年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連他自己創辦的民族學研究所，相關研究、討論也非常少。一開始我是抱著彌補空白的心態來做這研究的。先是為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籌劃展示，介紹凌純聲先生其人其事，等屆齡退休，我才正式動筆書寫文稿。¹隨著研究越深入，我越發明白，只有對這麼一位跨越四分之三世紀，曾在中國大陸又在臺灣做開創性研究的人類學者做全面性的探討，才能真正打開一扇窗，窺得臺灣及中國人類學的學科史。²

凌純聲字民復，出生於江蘇常州武進縣，1919年與史禾結婚，育有一男三女。1924年畢業於國立東南大學（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教育科，1929年獲法國巴黎索邦第一大學民族學研究院（College of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Paris）博士學位。他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民族所）及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以下簡稱民族所博物館）創辦人。歷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研究員、史語所第四組主任、國立中央大學邊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教授、中研院民族所籌備處主任及民族所第一任所長，並於1959年獲選為第三屆中研院院士。他早期在中國大陸邊疆從事廣泛的田野調查，來到臺灣後又從事原住民的調查。民族學能夠在中國各門顯學當中突圍而出，民族所

- 1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常設展《從松花江到太平洋的人類學旅程——凌純聲先生紀念展》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NewsReview/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31412251&MenuID=530210530623576651&SSize=10&Fid=0&View=1&MSID=2012112816304433649，2017年1月16日開展。
- 2 本文改寫自筆者《凌純聲的人類學旅程：從松花江到太平洋》（出版中）書稿（以下簡稱《凌純聲》）前言與第一至三章。撰寫過程中，得力於魏捷茲一貫的支持和討論，莊英章、陳中民、蔣斌和黃淑莉對初稿提供很多寶貴的建議與訂正。本文初稿亦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惠予建議，特刊主編劉斐玟對最後修訂稿提出編輯意見，筆者衷心接納並斟酌修改。最後，我由衷感謝文字編輯黃宛瑜多年來不厭其煩地對我的文字提出最中肯的批評與修改建議。

能夠在中研院遷臺之後成功設立，其人其懷是我們需要了解的。本文聚焦其成長、求學背景，中國抗戰前後之經歷，以及他身為當時知識分子的「作者效應」。筆者以為凌純聲個人的成長與際遇孕育了他的民族學專長與偏好，也影響了他的學術生涯；而仔細爬梳其著作，我們也更深切領會到他的學術生命，如何又交互引導了他的生命史。

凌純聲先以民族學者自居，儘管後來在臺灣創辦了民族學研究所，但最後則以（不包括體質人類學的）廣泛意義的人類學者自居。³本文寫的是凌純聲生命史與他通過民族所的創建奠定臺灣人類學的學科建制過程，內容涵蓋20世紀三十年代新學科建立的時代脈絡、他所接受歐陸傳統的法國民族學訓練、所經歷抗戰期間學科地位和中研院組織調整的變化，以及其以民族學者自居到以人類學者自視的歷程。筆者認為，凌純聲畢生研究跨越考古、歷史、民俗、博物館及文化人類學，他的學術定位更趨近於當代的人類學者，而不僅僅是20世紀三十年代的民族學家。本文即由此定位撰寫凌如何以此胸懷，創建中研院民族所的學術格局。

作為人類學者，寫一位學者的生命經歷和學術志業，本來就不是要呈現一個制式的官方敘說，更不能通篇只有「個人」的敘說。我想呈現的，是一個有家人、有朋友、有學生，但也還有性格、有情緒的開拓者；我不能呈現只有學術著作或非凡事蹟的學者，我要呈現有生活（不管多少），也還有他自己本身的凌純聲。這本來就不容易，在我與凌不曾相識下更是難上加難了。所幸，我與凌先生有學術研究上的交匯，無形之中也促成了我訪問他女兒凌曼立的機緣。

我在美國佛吉尼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寫的是中緬邊境的景頗族（國際文獻上的Kachin人），也是凌純聲、芮逸夫與勇士衡1935-1936年間田野考察的人群。史語所迄今仍保留很多他們當年拍攝的影像，2002-2007年間，我與多位研究

3 臺灣人類學專業從設立以來就沒有用民族學之名，而依美式人類學作法建立包括考古、體質、語言及文化人類學四分支的廣義人類學建制。此與19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人類學／社會學與民族學專業的發展相當不同。至今臺灣大學及臺灣清華大學仍維持廣義人類學的格局，下有考古、語言、體質（生物）及文化人類學。

中國西南的碩博士研究生共同參與這批影像的數位化工作。⁴2012年，我、黃宛瑜與博物館的楊雯娟為民族所博物館做了一檔「三十年代中國南方邊疆民族典藏展」，2017年又與博物館員聯手策劃「從松花江到太平洋的人類學旅程—凌純聲先生紀念展」（以下簡稱「凌純聲先生紀念展」）。2020年寫完《20世紀30年代中國景頗族影像志》一書，交由雲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這一連串機緣，讓我對其民族誌調查材料較為熟悉，最重要的是，我因而有機會通過電話和書信訪問凌曼立女士。⁵我們通過好幾次電話，每次訪談都超過2個小時。凌曼立憶述的一切，大多是從母親那邊聽來的，她說：母親年輕話很少，但年紀大了話越來越多。訪談中，她生動講述母親和祖母的大小事，精彩絕倫，我因此明白除了自身的天賦和才華外，造就凌純聲一生成就與品行的，來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母親與妻子的教養與成全。⁶

本文有關凌純聲的資料，除了使用他個人的出版著作以及他人評論與悼念文字外，還引用了幾項口述、訪問材料，以及中研院總辦事處、史語所、近史所、民族所、胡適紀念館的檔案資料。口述及訪問材料包括：(1) 由凌口述、宋龍飛（1936-2013）撰寫的〈凌民復年表〉（1985，以下簡稱〈年表〉），(2) 凌寫給張光直的書信（1955-1971），(3) 筆者2016、2021年以電話和email與凌曼立女士之訪問對談，以及(4) 我、蔣斌與劉斐玟為民族所博物館策劃展示（2012-2021）而訪問本所早期研究人員石磊、宋龍生、吳燕和、許嘉明等之內容。這批檔案資料、他本人的口述和私人信件，以及親人、學生的訪問材料，彌補了既有僅從出版品了解的片面化限制。以下特就口述和訪問材料做一概要說明。

首先，〈年表〉約莫是凌純聲1975年左右口述的，因此架構和細節應該都是他設定的，此後再由曾任其助理的宋龍飛協助整理。〈年表〉中，宋詳述成稿的來龍去脈。1975、1976年間，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與聯經出版公司談好要出版凌純聲論文集後，就安排宋龍飛負責整理文稿；宋龍飛在故舊門生的建議下選了五十六篇文章集結成書，定名為《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

4 史語所「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資料庫」（<http://ethno.ihp.sinica.edu.tw>）。

5 感謝《臺灣人類學刊》編輯林容如提供凌曼立的email訊息，使後續訪談成為可能。

6 凌純聲大女兒希立寫了一篇回憶祖母的手稿，〈凌家的女強人——憶祖母凌岳氏〉（凌曼立推測是在2002年所寫），文中敘說凌母親過人的膽識與才幹。曼立老師已將手稿轉贈民族所博物館。

序文由蔣復璁撰寫，而「編者（宋龍飛）亦擇其畢生行誼著手撰寫凌純聲年譜，每寫一段，均與先生及夫人討論，無誤始定稿」（宋龍飛 1985c：540）。

〈年表〉大約15,000字，除了詳列凌學術著述（著作書目約2,500字）與榮譽外，更涵蓋其家世與父母、妻小，對音樂的愛好與專長，成長背景，赴法留學及在學術與政府機構任職的經歷，主持田野工作、研究計畫，創辦學會，推動學報復刊等事。〈年表〉臚列的，應該是凌自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蹟。

其次，凌純聲寫給張光直（1931-2001）的書信都出自張光直夫人李卉及中國考古學者陳星燦編著的《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2005）。時間跨度上，雙方從中研院民族所籌備處成立那一年（1955年）開始通信，寫到他卸任民族所所長隔年（1971年），共58封。這是一份非常珍貴的史料。凌先生對這位他預期會「青出於藍」的弟子幾乎是無話不談，視他為「學問知己」（李卉、陳星燦 2005：109），1958年讀了張光直寄來的文章，他寫道：

讀了弟文，異常興奮，深深覺得，我所做的是創導的工作（Pioneer work），你能發揚光大，幸如何之！我希望青出於藍，學生的成就大於先生，中國的學術，才能有進步。（同上引：69）

信中除了學術切磋外，還不時透露身心狀況，讓我們深切體會到他以「一己之力」創辦民族所籌備處的艱辛，瞭解他嘔心瀝血引領同行、培養下一代、為人類學在臺灣的建制化所投注的努力（陳星燦 2005：1）。

再者是筆者訪問凌曼立的材料：曼立是最小的女兒，1936年南京出生。大學以第一志願考上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多次參加考古系以及民族所的田野調查，並發表論文，後赴美改念圖書館系。1967年進紐約州立圖書館工作，2005年退休。我們的訪談是通過email、電話以及FaceTime進行，並經由曼立老師的同意全程錄音。第一批訪問是在2016年11月分三次進行，第二批在2021年7月21日進行，每次訪問都超過二個鐘頭。曼立老師思緒清晰，總能條理分明地侃侃而談；2021年7月21日，時隔五年再度訪問，85歲的她精神依舊。最後是訪問凌純聲的幾位學生：這批材料是2012年到2020年間，民族學博物館基於要補充館藏資料檔案以及展示所需，邀請了幾位曾參與過凌團隊計畫或一起收藏文

物標本的學生前來訪問。受訪者依訪問先後依序為吳燕和、石磊、許嘉明以及宋龍生。

除了出版品、檔案，以及相關訪談外，我亦側面比較凌與跟他時代背景或留學經歷相似的郭廷以、衛惠林兩位的行事風格，對照了解凌在史語所時期以及民族所草創時期的經歷。我看到的凌純聲是內斂、沈穩務實、堅毅而謹言慎行；但從他來到臺灣以後的學術研究，我看到的卻是充滿著想像力與創造力，正如寄情音樂那一面的他。蔡元培的視野、法國人類學的訓練，以及凌純聲本人國族國家情懷幾乎貫穿了他一生的學術研究，也成就了他作為一位「科學民族誌」開創者的貢獻。

二、成長背景

（一）家庭

凌純聲祖父曾任清朝武官，罷官後在常州東門行醫，為著名的傷科醫生。祖父後來決定讓家中四名子嗣改習人文，令入門媳婦跟著自己學習傷科醫術。在他成長階段，母親扮演無比重要的角色。五歲入父親開辦的私塾讀書，母親與其他妯娌執掌家傳傷科。父親早逝，母代父職，嚴格督導其課業。凌每每在生命關鍵時刻提到母親，並在字裡行間流露絕少在學術文章中出現的情感：

母岳氏端莊賢淑，精通傷科醫理，自十七歲于歸隨公公習醫器，行醫三十餘年未曾稍息。祖父鴻發功歿後，由妯娌輪流十日出診一次，所得診費，悉充大家庭生活必要之開支……。父玉佩公自幼身體孱弱，居家開館授讀為業。

1913……先生十四歲……奉母命與常州仙現橋史禾女士訂婚。……

1920……先生二十一歲，……奉母命返家完婚。

1929先生三十歲……獲法國巴黎大學頒發博士學位，葛蘭綽（Granet）師，擬留先生在巴黎大學研究所做事，蔡子民先生則希望凌先生再去德國研究一兩年後回國，但當時先生謹記在出國之日，母親臨別贈言：「術者謂汝年三十，我有關口難過，毋遲歸也。」是年母果病，因此辜

負兩位先生之盛意，毅然束裝返國探親。……1932先生三十三歲……八月十三日，母岳氏逝世，享年五十九歲，先生悲痛異常。（宋龍飛 1985：530-532）⁷

凌純聲的兒子亨立與大女兒希立，童年都在祖母身邊度過。希立還寫了一篇紀念文回憶祖母行醫的膽識英姿：

曾祖父……發覺祖母聰明過人，膽大心細、辦事果斷、為人耿直、體格健壯，雖屬女性，但具有男人氣魄。曾祖父選定接班人後手把手地教……，最後……由祖母承擔「凌氏傷科」牌子，患者不減當年。（凌希立手稿，頁4）

凌從小受母親嚴厲管教，「她（祖母）倍奉『棒頭下面出孝子』直到父親從法國戴了博士帽子回到祖母身邊，也是畢恭畢敬，唯命是從。也許是對祖母倔強直率的敬仰罷！」（同上引）。無論是凌希立寫的「凌家的女強人」或是凌曼立的訪問，兩人不約而同提到父親十分敬畏其母的心情。當時新文化運動提倡婚姻、戀愛自由。即使已婚，但在凌周圍仍有不少女性追求者。凌純聲的母親曾為此強力介入，確保他留在她為兒子安排、能夠安靜持家的傳統妻子身旁。凌曼立也說，父親對祖母的敬畏之情非比尋常，祖母過世後，父親看到祖母的遺照還會害怕。他個性的內斂、沈穩，謹言慎行，想必與母親的家教很有關係。

但是走上唸書做學問這條路，卻是凌自己的決定。高中畢業，母親希望他賺錢養家，但他違抗母命，偷偷報考大學。在家裡收入必須應付四房開銷而不甚寬裕的狀況下，是妻子拿了陪嫁的金條給他到南京唸書的：

我父親小時候念書念得很好……，我祖母在父親念到高中時，……要父親去「當舖」（就是現在的銀行）做助理、學徒……。父親很不高

7 〈年表〉將Marcel Granet（1884-1940）中譯為「葛蘭耦」，中國學界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則採「葛蘭言」。下文除引用凌文字時延用葛蘭耦外，其他都採葛蘭言。

興。祖母說這工作是可以賺錢養家的，父親不肯。他說一定要去考大學。……父親那時考試沒讓祖母知道，……還是偷偷去報考的。……在我們常州，只有幾個人考上這間。那時祖母想著，哪有錢給父親到南京念書啊？（凌曼立訪談，2016/11/16）

那時代，另一位聰慧的女性是凌曼立的外祖母。她當年嫁女兒的同時，做了一個很有遠見的決定：

我外婆家很有錢。外祖父住鄉下買了很多地，種桑樹養蠶，在上海開蠶絲廠……。母親12歲就跟爸爸訂婚……。外婆賣了很多東西後買了黃金分給母親跟姨媽。我母親結婚時，外婆給很多金條。

凌夫人陪嫁的金條，後來對凌和日後一家大小的生活都發揮了無比的效用，包括：凌先生上大學、去法國留學需要盤纏時；抗戰時期中研院搬遷西南，凌夫人一人帶著四個孩子找船逃難時；抗戰時期研究院薪水太微薄不足以養家時。

……我爸爸念大學的時候，有很多時候都是我媽媽拿錢出來給爸爸用，爸爸要去上大學的時候，媽媽就把她的錢放在那個書櫃盒子裡面，爸爸就拿了去上課交學費甚麼用…（凌曼立訪談，2016/11/16）

凌曼立也敘述1938年她母親一人帶著四個孩子逃難的經歷：

那時候所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年輕人都要押運啊！因為這些都是國寶！我父親他們跟著就走了……。我媽媽就帶著四個小孩，我哥哥姐姐、還有二姊、我……，那時候我哥哥好像15歲已經唸中學了。……她花了錢就找人家，在長江裡面德國船飛機不撞，因為德國跟日本是聯盟嘛，德國船大家就買光了。有很多是走私的，就是拿了錢他就把你送上德國船去……。她就找到人，拿她的黃金、金條買命。媽媽說都是晚上，趁著夜色把他們送到那邊，然後爬上去。那個時候我

媽媽說她這個金條怎麼帶啊，就是我哥哥姊姊，我們穿的衣服的邊、袖子，把那個金條縫在裡面……。我們就住在那個船艙底下，那個船都住滿了人……。我媽到了長沙以後就跟我爸爸他們碰頭，因為長沙是個大的城，中央研究院就在那裏停了下來……。往下就跑到昆明去了。（凌曼立訪談，2016/11/16）

凌曼立說母親年輕時很安靜，話不多，從來不過問父親工作上的事。凌作為民族學家，總要四處做田野，早期出田野更是路途遙遠，艱難又不安全，但師母對此毫無怨言，全力支持。師母認為他「看事情看得很透徹，他做什麼決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對的」，兩人從不吵架：

母親念小學畢業後，因為很內向，不肯去念書。外公很疼媽媽，想說女孩不念就不念。所以後來母親就沒再念書……。我母親都是在父親背後，完全不出面。開會或到外面去，人家太太去，我媽媽都不去。後來偶爾有時會去一下。我母親長得非常好看，我們家的小孩都像我爸爸。聽算命的說，家裡誰兇，小孩就像誰。我爸爸在家很兇，我們小孩就長得像他。（凌曼立訪談，2016/11/17）

凌曼立說：「那個年代是嚴父慈母，爸爸回家從來不會和孩子多講話，只問功課、成績好不好，家兄、姊都好怕父親。父親在家從來不提學術研究的問題，只到老年時研究嚼酒文化、宗廟祭拜儀式時候才向家母討論過。可以說父親研究工作完全是書中自有黃金屋。」（2021/7/8凌曼立email訊息）。我不曾見過凌先生，訪問中聽不出他的情感或性情，因此很直接地問曼立老師，「凌先生從來不發脾氣嗎？」她說：「我爸爸會發脾氣。我知道至少有兩次」，「外面受了氣回來，不聲不響地就把飯桌給翻掉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發脾氣，我母親也不知道，她也沒有告訴我……。但他們之間從來沒有互相吵」（凌曼立訪談，2021/7/21）。

訪談中，總覺得凌先生與妻子的關係融洽，看似天作之合，卻又像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戰亂逃難時，凌以研究院書籍、文物為重，家人的安危與生計一切交由妻子打理。那個年代在邊疆做田野危機四伏，出行後音訊渺然；

到了臺灣，凌又全力埋首建立民族所，可以說，幾乎是妻子一人用丈夫微薄的薪水治內持家。凌先生在家扮演嚴父的角色，幾乎不苟言笑，也不談辦公室的事。當然我們可以用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說法來了解，但這看似兩條平行線的關係，他們各自性情的意象總是矇矓而模糊。反覆琢磨，後來我在以下這段話中明白了一些道理。

在四川的時候，他們做很多田野調查……。父親要出去，母親從來沒有說你不要去……。有一次……，父親去西康還是哪裡……，一去六個月沒有一封家書。⁸通常父親出去都會寫信，寫信要幾個禮拜，可是我母親還是會收到。這次，……我母親就跑到研究所去問，他們也沒有辦法，他們說不知道。接著我母親日夜擔心，本來那個時候我母親三十幾歲，全頭髮都是黑的，都急成白的了……，一半都白掉了，而且眼睛也看不見了。那個時候中央研究院那個醫生跟母親講，說是缺少維他命E……。她那個時候還帶著四個小孩，爸爸出了事，要怎麼辦……。可是母親對於父親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從來沒有任何怨言。（凌曼立訪談，2021/7/21）

凌先生與妻子並非兩個個體，而是內外並行、一起行動。凌夫人對先生完全信任，對他工作的重要性、田野的必要性絕對地理解；先生知道妻子持家不易，把薪水全部交給妻子，但研究員薪水微薄，必須靠妻子私房錢支應來養家。工作不順遂，雖然生氣到掀桌的地步，他從不多說。但對凌夫人而言，當該收到的家書沒有收到，這個家原有的內外秩序被打亂了，她急白了頭髮，視力大大衰退，身體從此不好。1942年，時任研究院代理院長及國民黨黨務要職的朱家驊打算派凌先生去新疆擔任黨委副主任，並成立研究室，但最後凌頂住了所有壓力沒有接任，並不惜辭職，其中最關鍵因素正是妻子身體孱弱。他們

8 根據〈年表〉，此時應是他42歲（1941），參加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的川康嘉戎及康人（Kham）考察研究之行（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未刊稿，頁70-71；譚旦厝1960）。凌任團長，芮逸夫亦同行（王明珂2010：288；胡其瑞2020：120）。

之間擁有的，就是相互支持簡樸過日子的那份滿足：妻子喜歡看電影，凌拿到稿費，夫妻便相偕看場電影；偶爾買了條好魚，凌就小酌一番：

我爸爸會喝酒，像我媽媽偶然燒了一條很好的魚……，爸爸會說我的白蘭地拿來喝一杯。那一瓶不知道喝了多久啊，每次就是我媽媽燒魚，他就喝一杯白蘭地。（凌曼立訪談，2021/11/21）

（二）音樂天賦

凌才華橫溢，音樂天賦尤其過人。他自唱自演京戲，自學法文，成功到法國留學，拿到博士學位，還演奏東方樂器和京戲玩票賺零用錢。音樂天賦對他後來的學術生涯都發揮了作用。六歲起，便「常與堂兄們一起觀戲，對京戲音律發生興趣。……每逢年節與堂兄弟等八人，在自家飯廳中搭戲臺自演自唱」（宋龍飛 1985c：530）。早在成為人類學家之前凌便享有「東南音樂家」美譽（蕭梅 2003），與友人合編一本樂舞圖譜《霓裳羽衣》（凌純聲、童之弦 1928）。他自己曾說：「除西洋樂器鋼琴不曾接觸外，其他中西樂器，無論管樂或弦樂器均曾把玩過」（宋龍飛 1985c：517）。凌曼立還聽母親說：父親留法期間，當時很多人喜歡看歌劇，也對東方文化很有興趣。「我爸爸從彈古箏、二胡、簫他都會嘛，他們又吹又打，學生在那邊過年就賣票賺錢，然後他說有的同學要回來的時候沒有旅費的話，他們就來唱一齣戲……，用這個方法來籌錢。」抗戰前，玩樂器是他的嗜好：

我父親從法國回來，他有一個房間在我們家鄉，就是老家常州。有一個房間裏頭全部放著樂器，各種各樣的樂器他都會彈，……牆上都掛滿了。……我爸爸他平常在家裡，從上海回常州的時候，他就一個人關在屋裡玩他的樂器，這個是他的hobby。

……日本人來了以後，全部被日本人毀掉了……。我媽媽說我爸爸傷心傷透頂了……。抗戰以後他就完全沒有（嗜好了），到臺灣的話，生活條件根本就完全不許可。（凌曼立訪談，2016/11/17）

凌曼立還說了一段父親用音樂安撫女兒、掩蓋女兒哭聲的動人細節。凌先生自法返國，便轉往上海，去社科所底下的民族學組任職，全家人住在上海租界的房子。那時候二女兒才出生，

晚上很安靜。我這個二姐從小就愛哭，她白天睡覺晚上哭，……小孩就哭沒有辦法停。我父親他會拉小提琴，拉琴拉得很好聽，音樂嘛，就把我姐姐的那個哭聲蓋過去了……（凌曼立訪談，2016/11/16）

無論是從辦公室回到常州老家鑽進樂房鎮日不出，或是在夜深人靜拉琴平撫女兒免得嬰孩哭聲打擾鄰人，音樂的確對他的情感發揮了很好的紓解作用。這份音樂的天賦，也很自然地出現在凌純聲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蕭梅（2003：23-25）認為赫哲一書有「獨具特色的薩滿神鼓音樂描寫」：「這種方法與中國傳統鑼鼓經的狀聲法、歷史上鼓板一類的手法譜同出一轍，體現了考察者對音響及其發生方式、表演手法的敏感，對赫哲鼓樂中音色與節奏穿插的藝術性捕捉，也為後人『恢復』此鼓樂，留下了重要的摹本」。凌曾以「活的收音機」比喻自己記錄赫哲民歌的方法：

研究一民族的歌曲，最科學的方法是用收音機。然這種設備，不是常常可以做得到的，其次則可以用記錄的方法了。著者的方法，是先叫他們唱一曲，唱了好幾遍，再一句一句的慢唱，至每句的音聽清了，把音記下來，再叫他們慢唱，自己看記的音有無錯誤，又叫他們照平時的快慢來唱，以定拍子，最後跟他們合唱學腔調，並注意其強弱高低。開始的時候非常的慢，第一曲費了五個晚上方能記成，到後來乃愈學愈快了。我學會一曲，至完全能唱得順口時，就去唱給別的赫哲人聽，經過幾個人說不差，就算學完一曲，一共學了二十七曲；對於赫哲唱歌已得一個大概情形，其餘的亦是大同小異，乃停止學習；但是我這個活的收音機，究竟比不上機器，學了恐怕忘掉，所以每天晚上總把二十七曲，從頭至尾唱過一遍；唱歌本是樂事，然如此的唱歌，乃是苦工了。（凌純聲 1934：146-147）

凌也交代他學唱以後設法紀錄下來的經過：

自松花江調查回來的時候，道經北平與先師劉天華商議整理的方法，並共同整理一曲。回到上海得友人吳伯起的幫助，費了許多功夫才把他整理出來，現在可以按譜演奏，可惜沒有知音的赫哲人在此給我們一個評語。（同上引）

這種收集或紀錄音樂材料的方式，不是每位人類學者都能做到。他個人的音樂專長與興趣，促使他來到臺灣成立民族所籌備處時，特別規劃了一間民族音樂陳列室，並邀請音樂學者加入民族所刊物的寫作陣容，如莊本立（1963）。只是凌個人的這一項天賦與嗜好，傳承不易，只有在他所提拔的吳燕和身上看到閃現的火花。

吳燕和在民族所籌備處成立不久就進所裡任職（1958），凌聘任他的理由就在於他的繪畫才華，所以吳燕和一開始的工作是畫標本、攝影。後來在凌的鼓勵下，成功考上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為他的「關門弟子」，並參與過早期各項研究計畫的田野（吳燕和訪問，2012/5/24）。他說：「我是他的小跟班，很多事情他只有跟我一個人講」。吳燕和記得凌要他記錄、研究阿美族的歌舞，但他不明白怎麼做，凌就擺出手勢、身形教他。音樂方面，凌先生用彈琵琶的手勢做比喻，告訴他各指法的差異和不同的記錄方式；舞蹈方面，凌就邊舞起當年去湘西做調查時「隨著他們（苗人）一起跳舞」的模樣，邊要吳學著一起跳。訪問當下，吳燕和就哼著調子，搖擺著身體，表演當初凌表演給他看的樣子，還很得意地在書上指著他自創的阿美舞譜給我們看。在吳眼中，凌是一位「寬宏大量」，能「欣賞人」、「取人長點」的老師，一位「器重人才」的先進（同上引，2016/4/11）。在我聽來，凌有其感性的一面，而這一面除了表現在音樂、戲曲表演，還展現在他創立民族所的熱情與魄力。

除了吳、凌兩人難得的親近情感外，吳也曾提到他初入人類學殿堂與凌相處的點點滴滴，包括民族所同仁對凌的敬畏，以及那個時代從大陸來到臺灣的學者不被理解的落寞：

凌先生塊頭大、嗓門也高，眼鏡後的雙眼炯炯有神，令人生畏。他到所裡上班那天，所中如臨大敵，戰戰兢兢，二樓一片寧靜，只聽凌先生江蘇武進口音的大嗓門講話。有天我經過凌先生門口，看見鄭格（何按：當時所裡的會計兼負責沖洗放大、翻拍書籍和標本室臺灣土著各族標本）站在他辦公室桌前輕聲答話，兩腿不停的發抖。凌先生不來上班的兩、三天，特別是暑假期間，所裡一片歡樂談笑聲。（吳燕和 2006：109）

之後，吳燕和又用他生動的筆觸寫下他就讀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期間聽凌講學的情景：

凌先生教我們『人類學導論』，他的家鄉國語一開口，底下全傻了，班上除了江浙同學之外，只有我聽得懂，所以我的筆記是班上同學搶借的對象。有次，他叫嘉義來的陳春欽起來回答問題，陳春欽的國語凌先生也聽不懂，只好叫我翻譯。有一堂課，他講了半天，大家猜不出到底是在討論『人』還是『神』，凌先生的翻譯都是『森』。其實凌先生的導論博引古今，貫通考古學和民族學的理论，可惜大部分同學受語言隔閡，無法敲開學生對人類文化發展的認識。（同上引：118-119）

這些讀來有趣的點滴，也解釋了為什麼我總覺得無法從上過凌課程的幾位前輩口中得到凌性格的輪廓或細節，因為他們師生之間的距離非常遙遠，相對的，也讓我對凌的寂寞更為悵然。如果沒有音樂、舞蹈作為凌、吳兩人的橋樑，凌的情感面向恐怕不為人知了。

三、來臺前經歷

在本文構思階段，我總是納悶為什麼像凌這樣一位開創性人物，研究其生平經歷的文章如此之少？不但不見於他工作了17年的史語所，連他自己創

立的民族所，也少有談論。我從對凌的女兒、學生的訪問中，或從凌的各類著作，的確掌握了一些他的喜好與性情，但是單憑所聽、所讀，凌先生個性仍然模糊。相對而言，與凌同在1955年被中研院任命籌備新所的郭廷以（1904-1975），其資料卻是鉅細靡遺。在他為近史所創設的口述史傳統下，無論是自傳、訪問或是相關研究，郭的性格顯得有稜有角。凌、郭兩位，年紀相當，分別生於1900年和1904年。凌在江蘇常州念中學，而郭唸到初二就從河南開封轉入南京中大附中；兩人先後從東南大學畢業（凌是1924年，郭則是1926年）。除了成長時空社會背景相似外，兩人的政治立場也頗相近，與國民黨多所接觸，先後出任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一職。自1955年前後，二人常一起搭公務車從臺北到南港通勤上下班（高去尋 2005）。凌曼立也說他們是很熟悉的朋友。⁹在這些相似生命閱歷的相互映照下，可以讓我們對凌性格有較具體的了解，繼而明白凌行事低調、內斂的一面。

1920年代初，郭廷以因在開封領導學潮被迫轉到南京附中，之後在東南大學安靜讀了一年半的書，直到東南大學爆發學潮（張朋園等 1987：139-147）。無論是自傳、訪談，或相關資料，都鮮明地呈現出郭對日本侵華、五四學潮的仇恨與憤怒，以及這股憤慨的情緒又如何挑起他的反日立場，促使他參與政治化學生組織及運動（同上引：82-88；蘇維新 2017）。這種外放高昂的情緒與批判的行動，卻從來不曾在凌的經驗或敘說中出現。我們從〈年表〉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中學經歷。凌先生1913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五中學（前身是常州府中學），成績好、品行好，同時還是田徑、足球場上非常傑出的運動員；他也在劉天華指導下演奏銅管樂器，擔任第五中學高中軍樂隊指揮，又「從劉天華習二胡、童伯章習崑曲，陸秉黃習古琴……從沈紹周習琵琶」（宋龍飛 1985c：517）。民國八年（1919）爆發五四學潮，但〈年表〉完全未提此事，只說：民國八年九月凌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大學（後易名東南大學，再改名中央大學）工科肄業，民國九年，凌時年二十一歲，改修教育科，二月「奉母命返家完婚」。民國十年，凌二十二歲，「長子亨立出生於常州」（宋龍飛 1985c：531）。¹⁰

9 凌曼立訪談，2021/7/21。

10 我把南京當時發生東南大學學潮、反日運動等時代背景約略說明後詢問凌曼立是否聽其父說過這些事件或感想，她表示從沒聽父母親談及這些事。

1925年冬，東南大學學潮延燒（張朋園等 1987：139），但凌已於1924年畢業，沒有直接遭逢學運。隨後，應聘南京高等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即郭廷以到南京後所上的中大附中）執教，兼教務主任，「於課餘自修法文，積極準備赴法深造」（宋龍飛 1985c：517）。換句話說，學潮蔓延之際，凌人也在南京，且在附中教書，他非但沒被波及，也沒參與，他就是安安靜靜地教書、自修，走在求學、求知和嗜好的培養路上。凌對時局的反應，完全不同於郭，他保持緘默，沒有留下一言半語。

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畢業後，凌利用教書之餘，自修法文，最後成功到法國留學（1926-1929）。1928年取得中研院聘書，1929年取得學位歸國。除了上文提到他與朋友票戲外，在巴黎大學期間，他也曾赴德國「參加國際音樂大會，會中演奏古琴」（同上引：517），這場演奏的影像，以及凌在法國表演的節目單都有被保留下來；但除此之外，我們就再也找不到凌在法國生活的資料了。但如果我們拿衛惠林（1900-1992）在巴黎（1927-1930）的生活作對照，凌先生個性的特點就清晰許多。衛惠林是凌純聲在臺灣推動人類學科建制化最重要的夥伴，他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鮮明，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巴金相熟（衛紀慰 1996；散木 2001a, 2001b, 2001c），因此，不但研究衛的文章較多，甚至還有對衛個人政治理念的訪問（Avrich&Wei 1995）。相形之下，凌情感內斂，靜默寡言，個性沈穩務實，與衛的情感外揚、性格激躍，有巨大差異。儘管凌留法的材料很少，但我們從他的學術著作可以看出這為期三年的法國求學生涯為其提供相當扎實的訓練，包括：民族學資料收集、研究方法及寫作，以符合當時的科學性要求；從而確立凌「結合民族學的古史研究」視角，以及日後開展「中國古代與環太平洋文化」的文明取向。

回國後，凌的民族學者生涯自此展開，並進行了多項的田野考察。〈年表〉所載如下（宋龍飛 1985c：532-533）：

- (1) 1930年春夏間與商承祖「同往合江及松花江兩省下游調查通古斯系的赫哲組，歷時三個月」；
- (2) 1933年，與芮逸夫、勇士衡等「赴湘西調查苗族文化與民俗」；
- (3) 1934年，「偕同芮逸夫、勇士衡赴浙江處州舊府屬麗水，調查畚民土著文化」；

- (4) 1935年，「偕同陶雲逵、芮逸夫等……赴雲南，調查西南民族夷人」；
- (5) 1935年，與芮逸夫「在雲南佯瓦山滇緬邊界調查擺夷、佯瓦、傈黑、崩龍、老亢、傈僳、羅羅、阿卡等族的生活狀況、社會情形及土司制度」；
- (6) 1936年1月，「續至雲南，在葫蘆王地佯瓦山中調查」；
- (7) 凌在大陸做的最後一趟田野是1941年7月至1942年2月赴「川康嘉戎及康族區」考察（同上引：533）。凌認為這一系列的田野調查是「他得益最多，最愉快的時期」（李亦園 1998：745）。

除了田野調查和寫作出版外，凌1934年12月聯合「何聯奎、黃文山、衛惠林等先生在南京發起組織成立中國民族學會於中央大學中山學院」（宋龍飛 1985c：532），並主編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民族學研究集刊》。1937年抗日戰起，會務停擺，直到1954年才在臺灣復會。¹¹中日戰爭爆發前一年，凌結束中英會勘滇緬南段界務之行，返回南京準備撰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草成一半」，中日戰爭爆發。1937年8月凌與研究院一起「避地西南，首遷長沙，再遷南嶽」，1938年1月「再隨史語所遷往陽朔，復轉昆明」。1938年秋，凌純聲、芮逸夫在昆，與四川的何聯奎、黃文山，以及在貴州的衛惠林、徐益棠籌辦《西南邊疆月刊》，「初在昆明創刊，後移成都出版」（同上引：533）。1940年11月「再遷四川省南溪縣板栗坳張家大院」，即李莊。1941年8月到1942年2月參加川康民族考察團。在研究院顛沛流離的這段日子裡，凌避過家鄉常州淪陷的劫難（1937年11月底），卻也經歷了學術生涯的重重關卡。

凌有深沉的國族主義情懷，但對政治沒興趣，更不會就政治問題積極表態；即使是跟民族學最相關的議題。1939年昆明《益世報·邊疆週刊》刊登〈中華民族是一個〉，引發各方激辯（1939/2/13-5/29，詳見周文玖、張錦鵬 2007）。三位當事人——傅斯年、顧頡剛、費孝通——當時都在昆明；凌雖然也在昆明，卻沒有對這個政治意味濃厚的論辯發表隻字片語。1939年凌時年四十歲，〈年表〉中僅有短短、淡淡的兩行字：「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暫駐昆明市郊龍泉鎮響應寺及龍頭書塢工作。」（宋龍飛 1985c：533）

11 1953年「十二月十四日，先生與李濟、何聯奎、芮逸夫、衛惠林等人發起籌備中國民族學會在臺復會」（宋龍飛 1985c：535）。1955年《中國民族學報》出刊（中國民族學報編輯委員會 1955）。

時局混亂，但對想做事的人而言，卻是契機與轉機。抗戰期間，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要員、中研院總幹事（1936/6-1938/12）及代院長（1940/9-1957/11）的朱家驊正是一例。1941-1945年，朱院長數度動員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館籌備處、中英庚款會之中國地理研究所，以及相關考古、地理、動植物學者，籌組「西北科學考察團」、「西北史地考察團」研究工作（王汎森等 2011：1241-1244，1383-1386，1396-1398；黃麗安 2010：184-189）。上文提到讓凌夫人憂慮萬分、一夜白頭的「川康民族考察團」，應該就是這個規劃最早期的部分。凌一行人1941年7月初自雲南李莊啟程，適逢雨季，連日大雨造成路崩，到了成都又碰到「大轟炸」，加上研究範圍遼闊，經費短絀，支應調查必須都不夠了，遑論日常生活開銷。凌9月16日從羌寨寫了封信給傅斯年：「此地寒苦異常，弟等月來僅吃青稞麥麵包谷等物，大米每斤肆元且不易買到至於豬肉自離灌縣以來已兩月不知肉味」¹²。不僅如此，此行還遭遇西康尚未完全平定的問題，行程不斷延宕，直到1942年1月，一行人才平安返抵李莊。但凌回到李莊，旋即遭遇別種波折。

當時國民政府非常需要了解西北邊疆，因此光是1942年一年，朱院長就先後多次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在中研院設立邊疆文化研究所、恢復新疆省黨部、以及做新疆的民族學研究；而在中研院方面，1943年，朱家驊也以院長的身分提出研究院組織方針修訂方案。在這三個層級相當高的組織調整和機構設立事件中，凌純聲都被點名為任事者或主持人，但最終都沒有結果。學術生涯困頓，加上時值抗戰，研究院經費侷促，田野經費完全沒有著落，微薄薪餉不敷家用。凌最後決定離開研究院，到中央大學教書，不久出任教育部邊疆司司長及邊疆文化教育館館長。〈年表〉中，他婉轉地交代這一生涯轉變：

（1942年）一月底自川康嘉戎及康族區調查完畢返回中央研究院……，

（1944年）仍專任史語所研究員，三月接掌史語所第四組主任。八月同時受聘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邊疆政治系教授兼主任……。

（1945年）兼任史語所通信研究員，同時仍任中大邊疆政治系教授兼主任。……七月，應朱驥先生之聘出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邊疆司）

12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26。

司長，於任內，創辦國立邊疆文化教育館，並兼任首任館長，於館長任內，除編印蒙回藏文各種教科書外，對在邊疆各地從事教育的工作者，亦多所殷切接待並鼓勵。（宋龍飛 1985c：533-534）

但傅、凌二人往來的信函，卻透露凌當時有名無實地撐起民族學研究的尷尬處境和無奈，以及他與凌夫人在這段艱困時期身心俱疲的煎熬。

1942年初朱家驊在國民黨八中全會提案，建議「以史語所之民族語言學專家李方桂或凌純聲領軍，增設有關邊疆民俗民族語言文化之研究所，由『語言學』入手，從事邊疆問題之純學術研究。」儘管八中全會決議成立「邊疆文化研究所」，但傅斯年等人以此決議政治目的太強、學術性不足為由反對（《傅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傅斯年函朱家驊」，李75-1；王汎森等 2011：1225-1231）。朱也同意「邊疆」二字「既不科學，又不能包括一切，此種開雜貨舖之辦法，甚不相宜，稱『所』而內容又非純粹研究，亦不合理」，決定不設所（黃麗安 2010：187、188）。

1943年2月13日傅斯年發函給朱家驊院長，提到反對成立邊疆文化研究所的另一個理由：恐讓史語所人類學組（第四組）面臨崩解的危機。吳定良（均一）認為凌「奉命籌備邊疆文化研究所」，第四組會有書籍去處以及第四組只剩他一人而不成組之顧慮¹³。同時，吳還要求院方就「人類學」（體質人類學）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對他（指吳定良）是否適合主持此學科做澄清。¹⁴傅在對朱院長轉述吳問題的同時，也表達了他對體質人類學的定位和主持人選的意見。他認為人類學是自然科學，獨立成所應該是「本院在抗戰後重建之一大問題」，而吳當然是主持人類學之唯一人選。

1943年2月15日傅又寫信給朱院長，洋洋灑灑陳述他反對成立邊疆文化所的理由，並提出以邊疆語言研究為優先的看法。在語言為優先的思路下，凌純聲所代表的「民族、民俗」研究，「自亦是極重要的學問，但研究所已有之，

13 「傅斯年函朱家驊」，李75-2，王汎森等：1222-1223。

14 吳定良（1894-1969）1935年受聘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類學組，1944年被任命籌設體質人類學研究所，是中國體質人類學主要奠基者。史語所當初成立人類學組，主要著眼於體質人類學，聘用陶雲逵、吳定良；民族學是當時蔡元培院長及凌純聲的用法。

待擴充耳」。另外，傅更直言：邊疆這個名目「已大時髦」（王汎森等 2011：1225），不少單位都想要做相關研究（如教育部轄下之大學），研究院再要成立一個所，經費上就有限制，題目大，錢又不多，「成績難期」（同上引：1226）。凌對此事顯得相當謹慎，沒有發聲。

綜合這兩份信函，可以看出傅怎麼看待已經浮出檯面的組織調整：民族、民俗之研究應該屬於史語所的範疇，而體質人類學則是可以獨立成所的。

1943年初，朱家驊院長認為新疆民族學研究甚為重要，再度向傅斯年「借派」凌純聲為該省黨部執行委員兼研究室主任。¹⁵在朱給凌的電報中，說明此案已得（新疆省主席）盛主委同意與歡迎，國民黨中常會業已通過、發布，總裁批准召見等等，請他儘速「來渝西行並物色工作人員連同經濟及調查……」。¹⁶新疆派令讓凌進退維谷。凌對黨務沒興趣，加之新疆時局動盪，家人反對，凌夫人身體孱弱，凌實在無法接下任命。他馬上致函傅所長婉拒，並向朱院長懇辭，甚至不惜辭掉史語所研究員之職位。¹⁷此事會發展到凌辭職的地步，還有一些認知上的誤會。朱院長認為凌早已答應赴新疆任職，傅所長也以為如此，但凌說他從沒答應此事。由於這個派令已經通過新疆省黨部主委，甚至已經安排了「總裁召見」，因此朱院長在電報中說「中止，則損失弟個人信用，無論如何盼速來渝西行」。¹⁸凌告知他決定「引咎辭職」，朱院長予以慰留，但仍請李濟持續說服。¹⁹最後新疆職位風波就在李濟說服不成而凌1943年4月1日寫信給傅所長說明整件事情來龍去脈後，告一段落。²⁰凌繼續留在史語所。

連著「邊疆文化研究所」設立案以及在新疆成立研究室二事，朱院長都希望借重凌民族學專長。顯然，民族學研究在當時是國家社會極需要的知識，也

15 1942年秋，新疆首長盛世才與蘇俄決裂，轉向國民黨後，當時身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認為該省「關係西北前途至巨」，當即恢復省黨部之組織，同時設立民族學研究室。中研院史語所有多筆關於凌赴新疆任職的檔案，主要是朱院長、凌、傅以及奉命幫忙說服的董作賓與李濟之間往來的電報與信函，時間從1943年2月23日到1943年4月1日。

16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朱家驊電凌純聲」，李13-4-2，李13-4-3。

17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4；「凌純聲電朱家驊」，李13-4-5；「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6。

18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朱家驊電凌純聲」，李13-4-8。

19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電朱家驊」，李13-4-9；「朱家驊電李濟」，李13-4-10；「李濟電朱家驊」，13-4-11。

20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14。

是「時髦」之學，很多單位競相做民族學研究。但二案最終都被認為就當時條件難有學術突破而作罷。朱院長1943年「推動修正中研院組織法，增設新的研究學科」，的確是個轉機。²¹無論是先前「邊疆文化研究所」設立案，或是新疆職位之派令，凌都是屬意人選（之一），但凌都沒有接受。凌除了婉拒書信外，沒有任何發聲。²²只有這次依學科立所的方針披露後，他才藉此機會，於1943年10月27日首次向傅斯年所長提出民族學獨立設所或是與社會學一起設所的意向。²³信函中，凌明白道出「與純科學之體質人類學」併在史語所底下「各不相謀」的痛苦，接著說明蔡元培當初設立民族學之初衷以及民族學在當前局勢下的重要性，最後婉轉說明民族學應獨立設所或與社會學併所之原委：

自民族組歸併本所而與純科學之體質人類學合成一組，二者各不相謀，八九年來，弟所感之苦痛，諒為吾兄所諗悉。如此次改組，範圍較小之體質人類學且得獨立，則民族學似亦有發展之機會，或與社會學聯合成立一所，亦無不可，因二者之性質與內容，甚為相近也。弟以學科之重要而論，民族學在近年來頗為國人所重視，如前年政府欲本院籌設之邊疆文化研究所，計畫書中規定之研究工作，大部份為民族學所致範圍。又民族學之在中國為蔡先生所首先提倡。以前民族學組在蔡先生主持之下，以六年之短時期，已具規模，工作成績……如能使民族學發展成所，藉以紹還蔡先生之遺志，且亦紀念蔡先生之一道也。……（《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27）

獨立設所的提議未獲正面回應，而院方另有打算的「傳聞」卻出現了。凌很著急，同年11月30日再度去函傅斯年所長，說「傳聞新組織法中與本所有關

21 1943年10月「中央研究院致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函」內附「本院組織法草稿」，上列有21所。民族學研究所與體質人類學研究所都名列其中（王汎森等 2011：1447-1456）。1943年修訂版則明定中研院將設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國文學、考古學、心理、教育、社會科學、動物、植物、哲學、教育學、法律、經濟、醫學、藥物學、地理、民族學、體質人類學23個研究所（黃麗安 2010：174）。

22 對於凌在這兩次事件中保持緘默及婉拒的態度，傅斯年院長認為「其意可感」（王汎森等 2011：1381）。

23 此檔案未標示年份，筆者從內文訊息推算可能是1943年。

之學科均有分立之說，未知究竟如何，但若其他學科果將分設，則民族學有發展之機會，尚望俯賜同意並予贊助」。²⁴但當時的院方、所方更屬意讓體質人類學獨立設所。²⁵從凌、傅兩人的信件往來，我們看到不久前凌屢次被推在最前方，民族學獲政府、院長高度重視，但等到凌提議獨立設所，以提升民族學時，卻無人理睬。想必凌應該是心灰意冷，才決定離開研究院到中央大學擔任教職。

1944年8月5日傅寫信給凌，請他澄清是否已決意到中央大學創辦邊政學系一事，²⁶凌8月19日回函坦言對民族學被邊緣化感到極度失落：

……自四組開獨立以來，「取銷」、「保存」、「下半年凌先生怎麼辦」，「所長對你談過四組計畫嗎？」「所長有信給你嗎？」如此冷言冷語，時有所聞。且當面來問時，尤令我難堪。□六月前，弟又無法能得隻字以闢謠。在五月中乃下決心，唯有一走了之，否則弟已失眠三月（每晚服0.6），長以下去，恐栗峯又多一精神病人矣。當初弟早與燕大有約，赴蓉講學，後聞方桂兄□辦法已不可能而作罷。乃接中大部設邊疆講座之聘。……七月初中大成立邊政系約弟主持……。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18）²⁷

所幸，到中央大學教育英才，培養邊政人才，也不失學者本色。1944年11月5日在凌寫給朱家驊院長的信函（附中國邊政改革芻議綱要一份）中，他說：

鈞座面諭准假一年……晚在院服務十六年近因國難其中經費困難又為□中範圍□所限工作不易推進故不如暫時離院出外教書或可造就若干

24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29。

25 1944年3月史語所聘凌為第四組主任，而院方也在同一年聘吳定良為體質人類學籌備處主任，打算在四川李莊設立籌備處。此籌備處最終因為「經費困難，所址無著，且人才延攬不易，……1946年決定暫停籌備，其工作仍由史語所收回接辦」（黃麗安 2010：177）。

26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傅斯年函凌純聲」，李13-4-16。

27 全文中引文凡筆者無法辨識之字皆以□表示。

人才將來無論研究邊疆或建設邊疆訓練幹部人員最為重要。中大在法學院中新設邊政學系投考學生三百餘人錄取三十八名可見青年有志邊疆者不少。（《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大陸時期總辦事處）》，「朱家驊檔案」，301-01-23-293，頁10-11）

之後，我們在檔案中看到的就是1945年1月31日凌從南京教育部寫信給傅報告他的現狀及目標，希望能夠為邊疆教育打下堅實基礎。信中語氣輕快，一掃先前沈重鬱悶之氣，凌似乎終於找到了可以一展長才的舞臺。²⁸凌曼立在訪談（2021/7/21）中說，凌任職邊疆司以及邊疆文化教育館期間，是「父親事業生涯中最開心的一段時光」：

我們從四川搬到南京以後，那段日子就是爸爸作官的日子，他後來就直接到教育部……。邊疆司就管蒙藏跟邊疆……。從1945年到1949年……，我父親一年都要去那邊調查，考察他們的教育。內蒙古也要去……，新疆西藏這兩個地方……去很多……。

在南京我爸爸就建立了一個邊疆教育館，裡面最大的就是一個陳列室，他每次去調查的時候，政府也給他們經費，他拿了錢就去買當地很多的文物，很多東西都運回來……。也資助一年印刷廠（筆者註：印教科書），他們教科書都是在邊疆教育館編，bilingual的，一邊是回文一邊是中文，或是一邊是藏文。……我父親那幾年作了很多事。

（凌曼立訪談，2016/11/17）

按〈年表〉，凌1944年8月正式「受聘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法學院邊疆政治系教授兼主任」；1951年才「回中研院史語所擔任專任研究員及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教授」。其間，凌與史語所的關係一直是「兼任通訊研究員」。1949年7月凌跟著中研院史語所疏散來臺，但他並沒有回史語所正式任職。或許是因為史語所搬遷來臺諸事艱困（楊樹人 1963：329），也或許是因為傅斯年對凌

28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函傅斯年」，李13-4-25。

「做官」一事並不十分諒解（凌曼立訪談，2016/11/21；2021/7/21）。為了保持研究院學術超然，傅先生認為學者不可兼任黨、公職。但傅先生很賞識凌在地理學方面的學識，稱許凌對「西南部族和中南半島的知識絕大」，也認為凌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至今（1943）仍為Ethnography在國內第一部書」（王汎森等 2011：1376，1381）。照傅先生的規劃，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必須要有人教地學通論，而凌自是不二人選。因此在考古系正式成立前，凌是以臺大「文學院教授，講授地學通論」應聘的，1950年才改聘為考古人類學系教授。1951年回史語所擔任專任研究員後，凌仍持續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任教，開展他立足於臺灣的人類學科建制化生涯。

凌先生個性淡定、內斂、沈穩、務實，對多事保持緘默，謹言慎行，但是當研究院擬設立新所時，他積極為民族學獨立設所的理想發聲，卻始終得不到回應，失落沮喪之餘，他決定改變生涯。這段時期最令他感到煎熬的，或許不是辛苦、貧困，而是學術政治上無法獲青睞或自主的落寞，空有一身不被學術界重視但政治上亟盼借重的學識。傅雖然支持凌，但總希望民族學附屬於史語所第四組。²⁹要獨立成立民族所，除了需要大環境支持，更重要的還是凌先生想要在中國各門顯學中突圍而出的那份心念。

四、立足於臺灣的人類學

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中研院民族所，以及中研院史語所考古及人類學組是戰後臺灣人類學學科建制化最重要的三個單位。建制化之始，李濟與凌純聲分別是考古學與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奠基者。民族所籌備處（1955-1965）一掛牌開張，凌馬上替臺灣原住民與漢人研究延攬重要研究人才，與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合作，培養新一代人類學家；成立了人類學的專業刊物；收藏臺灣原住民的文物標本與影像；以不到十年的時間蓋起民族所大樓與標本陳列室。陳星燦（2005：1）說，「他差不多以一己之力」創立了民族所，如此

29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凌純聲致傅斯年」，李13-4-20。

評價，絕對不是溢美之詞；而成立民族所的這股魄力，乃出自凌純聲明確的民族學信念和從史語所歷史學突圍而出的勇氣。

（一）突圍而出的民族學

1954年12月30日，中央研究院在臺院士第二次談話會中決定民族學一組原設於社會科學研究所，後移歸史語所第四組，主持研究，如有必要，自可獨立建所（中央研究院在臺院士四十三年第二次談話會，《中央研究院公文檔案》）

「自可獨立建所」的法源來自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三條（王聿均 1985：204）。民族學獨立設所的聲音，早在1943年朱家驊院長推動修正中研院組織法，增設新的研究學科一案，並提出《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修訂版時，就已經出現了。1947年3月13日第一次院士會議也確立「修正公布國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三條規定本院設23個研究所：數學、天文、物理、化學、地質、動物、植物、氣象、哲學、教育學、中國文學、歷史語言、法律、經濟、社會、醫學、藥物學、體質人類學、工學、心理學、地理、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所；另，「必要時，得依評議會之決議，增設其他研究所或研究室」（中央研究院 1947）。

民族所設所之決議直到來臺後1954年12月30日才再度確立。1956至1958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職的楊樹人（1963[1958]：331-332）對此有很扼要的說明：當時有鑑於僅有數學和史語所兩個所來臺，而中研院「這個機構，絕非數學和歷史語言兩個研究所所能單獨承荷的。在可能範圍以內擇優恢復原有的，或新設有需要的研究所，似乎是環境所要求的」。那時候優先考慮的是植物所與近代史研究所，另外還擬將考古學獨立設所，而「民族學的研究工作，在適當的時期也可以獨立設所」。站在院方的立場，民族所獨立成所有其迫切性，理由是：「臺灣的高山族同胞迅速接受新文化，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眼看就要消失掉了，有迅速研究紀錄的必要，所以另外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由史語所研究員凌純聲領導這項工作」（同上引：332）。

民國44年（1955）8月1日民族所籌備處正式成立。在籌備處拍板定案前，史語所內部其實是有雜音的；對此，凌擬稿重申分所原委，闡述蔡元培設立民族學組的初衷，以及無法獨立設所之缺失：³⁰

一、民族學組為蔡院長創立並自兼組主任昔在社會研究所時已具相當規模。自改屬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增加體質人類學合稱第四組。史語所包括學科較多，民族學研究之人事與經費所得最少。十餘年來，甚少發展。

二、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或二十二日，筆跡不詳）晚芮逸夫先生□□面告，院中將增設新所，考古所亦將分立，且已造列預算。芮先生謂民族所亦應分出並希望由純向院提出。純□將此意面請周總幹事轉達朱院長，³¹幸蒙採納於去年年底提出院士談話會。朱院長又於今春在南港召集史語所及總辦事處同人談話。會中□提及民族所於今夏成立。

臺灣的土著民族保存原始文化甚多，為研究東南亞及環太平洋民族文化的寶庫。如成立一民族學研究所，能做的工作很多，且在民族學上可有特殊的貢獻。民族學所之分設係由第四組主任芮逸夫提議面囑純向院方提出。本組僅專任研究員二人，事前均已同意，現院長已宣稱暑□成立，不能出爾反爾再有其他。純□□當然贊成分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檔案》，未編號）

此處說「本組僅專任研究員二人」，是指凌本人與芮逸夫，因此顯然針對獨立成所一事，二人意見一致，均表贊同，院方業已同意。凌說的「出爾反爾」者，照前後文看來，應是指芮先生。事實上，從民族所籌備處成立，一直到正式設所，芮一直留在史語所。凌、芮二人各自或一起在中國邊疆做田野、採集的文物，也直到1965年才從史語所以「借出」方式陳列於民族所。

30 這份手稿收藏在民族所公文檔案中，沒有編號，亦未標示日期，但根據內文可以確定時間大約落在「在臺院士第二次談話會」召開（1954年12月30日）隔年，到1955年8月1日民族所籌備處成立以前。

31 周總幹事即周鴻經，乃中研院第九任總幹事（1949～1956）。

凌那份手稿，除了暴露史語所內部對民族學獨立設所的雜音外，還點出當時必須成立民族所的關鍵學術理由：臺灣土著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學研究的寶庫，而民族所是最能對臺灣土著文化研究做出成果和貢獻的。後來幾個年度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概況」，對此有更進一步闡釋：

民國四十四年七月，本院遷至南港現址之初，因鑑於臺灣島上為數近二十萬之土著族尚保存極豐富之原始文化，實為研究民族學之難得寶庫；同時又基於二十年民族學組之已有成績，乃決定民族學之研究工作，依據本院組織法，單獨成立民族學研究所。同年八月籌備處開始工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檔案》，未編號，筆者推測為1960年之後所寫）

不可否認，蔡元培早就有成立民族所的規劃，但民族所獨立成所一案可謂一波數折。1940年代在戰時的李莊，民族所設所一事就已經被當局以優先成立體質人類學所為由予以擱置；1950年代到了臺灣，又受史語所內部雜音牽制。無論是30、40年代的「邊疆民族」或是50年代臺灣的「土著族」，都是民族學研究的專長，但卻受困於寄人籬下的學科狀態，不斷被邊緣化，無法獨立成所。所幸，凌純聲的民族學信念促使他從更寬廣的時空視野尋找中國文化的層層積累與多元性。基於這樣的民族學信念和他想從各門中國顯學中突圍而出的勇氣，籌備處最後終於成立了。

（二）凌先生的民族學信念

凌到了臺灣，讀到日本統治時期留下豐富的臺灣人類學研究，研究思路轉向如何從民族學的角度為臺灣在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中尋找定位。還沒有返回史語所任專職前，他就開始做臺灣原住民的民族誌調查，一面多方參考日文、西文等國際文獻以及他非常熟悉的中國文獻，一面運用臺灣大學從日治時期留下的文物標本做比較研究。³²1950年3月22日，他發表第一篇他所謂「緣

32 1949年冬，凌任職於臺大考古系，開始收集獵頭祭材料；1950年，從臺大標本室兩件銅鼓藏品切入，寫了一篇「記臺大二銅鼓兼論銅鼓的起源及其分佈」（1950）。獵首與銅鼓是凌建立「東南亞古文化」最重要的民族誌材料。

起式」論文：〈東南亞古文化發凡〉。文中，他表示「東南亞古文化的區域應包括中國南部」，並指出臺灣在東南亞古文化區域的重要地位（1979a[1950]：333）。1952年，緊接著發表〈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進一步闡述臺灣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全文參考日本、臺灣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還參照凌1935、1936年間在中國西南做田野的材料，把既有研究沒注意到的中國第三世紀初《臨海水土志》的內容，拿來跟古今中外對相關地區六種文化特質的紀錄做比較，繼而主張「臺灣土著族與古代閩越人是同一文化系統的民族」（1979b[1952]：366）。〈年表〉一般僅條列重大事件，但凌卻花了些筆墨摘錄此文重點，足見此文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居住在臺灣的中國人（包括高山族、閩南人、客家人以及稍晚遷臺的大陸各省居民）都是屬於一個民族，其間唯一的差別，只是來臺灣時間的早晚而已。文中肯定的說「在公元以前，越人早由大陸移居臺灣，在一千七百年以前住在臺灣島上的夷州人和大陸浙閩沿海的安家民族是同一民族，有他們六種文化特質證明二者屬於大陸上古代越獠民族。（宋龍飛 1985c：520-521）

凌純聲（1979b[1952]：367-377）認為《臨海水土志》所稱的「夷州」就是當今臺灣，而「安家」則是當時臨海郡的土酋之姓，是「安陽羅江兩縣的地望」，並考證古越獠人分佈的範圍。同時他將《臨海水土志》所提的六種文化特質——棧格（干欄式家屋）、崖葬、獵首、缺齒、木鼓、犬祭——與後人對越獠地區以及臺灣的各種文獻記載逐一做對比（同上引：377-385）。³³

在此期間，宋文薰先生翻譯鹿野忠雄《東南亞西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中三篇談臺灣的論文，並將中譯稿集結成《臺灣先史學民族學概觀》出版（1955）。凌發現鹿野忠雄的方法與觀點，與自己頗相似，欣喜無比，特為此書寫序，刊於《文獻專刊》（1953）。文中，凌就他的「東南亞古文化」架構，做了非常清晰的總述：

33 凌認為「衣、食、居、飾等生活方式」容易模仿而不能作為「同系文化」的證據（同上引：367）。

筆者這幾年來，先後發表了五篇有關東南亞古文化的論文。我主張東南亞古文化或稱印度尼西安文化的分佈，北起長江流域，中經中南半島，南至南洋群島，在此廣大的區域中有可分為三副區：一、大陸區；二、半島區；三、島嶼區。又在此一文化的下層，至少尚有小黑人和美拉尼西安兩層文化。中國古代居於長江流域的獠越，與今之印度尼西安是屬於同系文化的民族。（凌純聲 1979c[1953]：1697）

1954年，又發表〈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從臺灣土著研究出發，闡述此區域的空間與歷史：

亞洲地中海的東南西三岸為弧形的島嶼所環繞，自北向南而西，有阿留申弧，千島弧，日本弧，琉球弧，菲律賓弧，摩鹿加弧，自帝汶而爪哇至蘇門答臘的馬來弧再北上有安達曼弧。在這一連串的弧形島嶼中之海，可稱之為廣義的亞洲地中海。……亞洲地中海為南北向，可以臺灣分開為南北兩地中海，有時我們稱北洋和南洋。……

時間悠久的中國文化是多元的，其形成是累積的，最下或最古的基層文化，可說是發生和成長於亞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1979d [1954]：335）。

他論證中國文獻中的「夷」是濱海而居的人群，而「夷的文化是海洋型的」，「華夏」則是自西而東的大陸文化（同上引：337）。中原文化乃是華夏與「海洋文化接觸之後，經二千多年的融合」形成的（同上引：343）。中原文化「戰勝了江南和嶺南的南夷文化，然兩文化的涵化迄今尚未完成。今至南海群島的馬來或稱印尼民族，尚保存了大部分固有的南夷或百越的語言和文化」（同上引：343-344）。這篇1954年論文清楚勾勒出他日後的寫作藍圖一走向世界的中國古史與環太平洋研究系列：

起於亞洲地中海的海洋文化或受西來大陸文化的影響，東夷向亞洲東北移動，渡北令海峽而入北美，南夷則南下先至南洋群島，在南太平洋中，逐島航行而抵南美。故作者深信環太平洋的古文化，起源於

中國大陸東岸，同時也是中國文化即上面所說中原文化的基層文化。

(1979d[1954] : 344)

凌先生適時運用了民族學知識，跳脫政治中國版圖，從區域、從更寬廣的時空視野，極具創造力地提出臺灣與臺灣人在中華民族與文化上的定位與價值。朱家驊院長或許是因為這些研究，不再理會史語所內部的雜音，積極協調民族學獨立成所的規劃。凌最終得以突破重圍，建立了獨立的民族所，開始立足於臺灣的人類學專業，正因為他對民族學知識懷抱著信念、熱情，以及當時知識份子特有的國族國家主義情懷。³⁴中研院於1955年8月1日成立了民族所籌備處，凌純聲擔任主任，1956年成立了標本室，1965年正式設所，並擔任第一任所長至1970年。

1954年1月中國民族學會，集結臺大、中研院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者，在臺復會。1955年8月中旬《中國民族學報》創刊，凌擔任主編。發刊詞中說明了此刊物對民族學研究範圍與視角之界定，以及臺灣與中華民族關係的立場與認知。³⁵不但國族國家情懷躍然紙上，民族學知識的獨特性也昭然若揭：

成長於中國之遠古文化，經近代學者之研究，其影響所及不僅在東南亞，且渡太平洋而遠至南北美洲。故形成中華民族之時間、空間、人文之因素，絕非如中國之傳統史家，所謂炎黃之胄源於華北數語即可解釋。此一部科學的中華民族之歷史，正待吾人努力以完成之……。

目下吾人口居臺灣，工作之園地較小，然臺灣…位於水路十字路口，古代海洋與大陸兩文化的交流，臺灣為常經之路。……臺灣土著文化保存中國遠古之海洋文化特多。在學術上，此不僅為東南亞民族學之寶庫，同時意味中國遠古史之活史料，再進一步言，又為環太平洋若干文化起源於亞洲之有力論證。（中國民族學報編輯委員會 1955 : i-ii）

34 凌純聲的國族國家情懷，請參何翠萍（1999）。

35 這篇發刊詞署名為學報之編輯委員會，但由誰主筆則不得而知。凌〈年表〉透露了幾位可能主筆或潤筆的先生：「（1955年）八月中旬，先生與李濟、何聯奎等人，創刊中國民族學報，並擔任主編。」

（三）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與人類學建制化的開始

1955年凌開始主持民族所籌備處，確立研究方向，在1956年寫給院方的「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籌備工作概況」中，他胸有成竹說道：³⁶

凌氏近年之研究著重於中國西南及東北民族文化與東南亞以至於環太平洋土著文化之接觸與關係。根據其多年研究之結果，認為中國古代之獠越民族和今日臺灣高山族以及東南亞各地之源馬來族系屬於同一文化系統，稱之為東南亞古文化，而此一文化之起源，乃在中國長江中下游一代，其文化之影響不但及於東南亞各地，且遠及於環太平洋諸島以至於美洲土著民族。至於中國古代東北方之東夷民族，其文化與太平洋中波里尼西亞及北美洲之土著文化亦有很大關係，稱之為海洋文化……。其重要工作方針有：

- 一、實地調查研究臺灣高山族的固有文化，及臺灣本省人的社會民俗。
- 二、研究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東南亞太平洋及南北美洲土著文化的關係。
- 三、整理本院民族學組近三十年來所收資料與標本。
- 四、民族形成與發展的科學民族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檔案》，未編號）

第二與第四項工作方針延續凌的人類學旨趣，而第一與第三項的工作方針則是民族所從籌備處設立迄今（2024年）一直持續不變的方針，也是凌的臺灣人類學建制上最基本的藍圖和指標。

1956年1月10日凌寫給張光直的信中，訴說籌備處成立4個月又10天以來方方面面的情形。雖然與史語所的書籍、文物等無法真正切割，但籌備處一成立，馬上得以展開臺灣原住民調查田野，購買書籍、儀器，面對嶄新局面，他的心情顯得格外愉悅：

36 此手稿未註明日期。從字跡看，是先生親擬；從內容看，此時他創辦的《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已出刊第一期，第二期也將在八月中付印。因此，筆者推定此稿係1956年8月之前寫就。

最近我們民族學研究所全體專任人員四人、工友一人出發至屏東來義鄉的望嘉、白鶯、古樓、文樂、來義等村社，調查排灣族……。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迄今，頗覺吃力，所幸亦園、李卉、先民三人異常努力，合作無間。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四組仍存在，書籍、儀器、標本至今未交來，民族所又是白地成家，現約可購新書與雜誌四千元，儀器一千元。我們購置圖書計畫：過去購書似乎太隨便，現以有限的經費，先注重地域即東南亞、東北亞、太平洋、南北美洲四區的重要新舊書籍。（2005：51）

民族所籌備處在臺灣人類學的建制化至少起到三大作用：一是培育及網羅民族學人才，二是創辦和經營專業刊物及圖書館，三是採集文物、影像與建立博物館。其中，第三項充分體現出凌純聲受法國民族學訓練之影響，同時也是蔡元培的叮囑與心願的實現。

1949年李濟在臺灣大學文學院下成立考古人類學系，³⁷培養學生研究中國考古學，臺灣考古學、文化人類學以及田野調查。³⁸考古人類學系從39學年度開始招生，課表顯示凌純聲從一開始就在考古人類學系授課，這一年他教「地學通論」及「考古人類學導論」。此後一直到74歲（1973），都任教於臺大，為人類學培育人才（宋龍飛 1985c：520，525）。除了「地學通論」外，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頭幾年，凌教「考古人類學導論」、「民族調查方法實習」、「世界民族誌」、「民族學專題研究（中國古文化與太平洋）」等。臺大人類學系迄今仍有由教師帶領學生做民族學田野調查實習的傳統，應與李濟和凌純聲立下的教學模式有關（凌純聲 1955：9，亦見下文）。

民族所籌備處成立之初，考古人類學系也才起步，人才尚在培育中，但主持臺大以及中研院民族學、考古學，甚至史語所人類學組的老師們，都求才若渴，在此競爭局面下，凌要網羅人才，充實剛成立的民族所籌備處絕不容易。考古學者高去尋跟凌純聲交情不錯，與張光直則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在1955年到1961年間寫給張光直的信中，即透露了民族所籌備處前期用人的情況及凌

37 1982年考古人類學系改名為人類學系。

3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之難處。³⁹針對民族所物色新人一事，高說「凌公渴望陳奇祿、唐美君能到民族所去，但是怎能辦到呢」，一針見血地點出當時人類學剛起步，在李濟主導人類學系的局面下，凌網羅人才的窘境（高去尋 2005：124）。

在推動人類學建制化的過程中，凌純聲除了積極投入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搶救與調查工作外，在開拓新的田野方向上，他最先著手的，就是網羅民俗學研究人才。⁴⁰1963年凌邀請劉枝萬展開松山慈祐宮醮典的調查，1964年12月劉先生獲聘為民族所研究人員（林美容 2020：vi），並於1967年出版《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這應該是除了凌外，民族所首位考察臺灣漢人宗教的專任研究人員。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是凌純聲的另一項創建。他除了督促當初進籌備處的每一位研究人員及學生積極投稿外，亦四處邀稿，張先生就是箇中常客。凌自己投稿之勤奮，更不在話下。甚至還親自校稿（李卉、陳星燦 2005：98）。

（四）博物館與文物影像收藏

1955年8月民族所籌備處成立後，隔年馬上闢了一間標本陳列室。隨後「1962……一月，先生爭取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補助，並自籌部分經費，著手興建民族所及民族學博物館。工程於八月動工。……」（宋龍飛1985c：523）。1963年民族所大樓蓋好了，凌無比欣慰，他與張先生分享了這份心情：

民族所新廈已落成，已搬入辦公，造的時候可說是「慘淡經營」，完成之後不僅寬敞，而且「富麗堂皇」，博得人的好評，堪以告慰！
（2005：102-103）

39 高去尋1934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馬上加入李濟執掌的史語所考古組做安陽發掘。畢生學術生涯都在中研院史語所度過，人品、風範備受敬重（陳星燦 2005：1-2）。照高的說法，他與張光直夾在李濟與凌純聲「兩大之間只能採取超然態度，既不介入，也不得罪任何人」（高去尋 2005：125）。而對留在史語所人類學組的芮與凌久結嫌隙一事，高說：「凌芮既已交惡，不能再讓凌李交惡，為天下人所笑。我願意為民族學著想，使中研院有一個像樣的民族所存在，不願意史語所還有一個不死不活的民族組」；他說：「我與凌芮二公私交都不壞，因為芮公是同輩故往來較多，但是凌芮兩公之交惡不知勸過芮公多少次了」（同上引：144、145）。

40 當年凌為民族所網羅之專任、兼任人才，包括衛惠林、鮑克蘭、林衡立、劉斌雄、劉枝萬等（詳見筆者出版中書）。

大樓中凌特別重視的規劃是博物館，田野相關文物、影像整理室及暗房，以及標本和圖書的儲藏室。這個規劃一方面出自完成蔡元培成立中華民族博物館之心願，一方面出自凌先生法國人類學訓練之體會。1930年，蔡元培在社會學社成立的演講中，曾談及他的民族學博物館願景：

現在民族學組的研究員，擬著手於浙閩畬民，與東北通古斯族的調查……。我們又聘定德國民族學專家但采爾教授（Professor Dr. T. W. Dantzel）……，他允許替我們選集關於民族學的各種材料……標本……器物……將為有系統的陳列。那時把我們自己採集的，與歐洲學者所已得的，參互考證，一定可以多有所貢獻。（蔡元培 1962[1930]：16）

當年剛加入中研院民族學組的凌純聲如此憶述蔡元培的叮囑：

其時先生（編按：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又兼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及民族組主任……，先生常言民族學研究在中國，當務之急，是實地調查研究……調查西北民族計畫……因故未能成行，乃改赴東北調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行前先生指示實地工作上一切應注意事宜，並一再叮囑需多搜集標本，並說：「標本除供研究外，可與國內外博物館交換，作將來創立中華民族博物館的準備」。（1960：411）

1936年凌出版〈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文中更進一步說明採集標本、攝影、繪圖等方法，並強調這些方法在建立科學性紀錄上的重要性：

標本在民族學研究上很佔重要。凡能攜帶的標本最好搜集。笨重或珍貴的物品，則攝影，量他的尺寸，並詳細記載他的品質或製作方法。搜到的標本須登記號碼、地點、土名、消毒。搜到相當數量即裝箱運回。標本非但可做研究之資料，且可陳列在博物館供人參觀而引起群眾對民族學的興趣，所以能多多搜集最好。（凌純聲 1936：75）

蔡元培先生成立「中華民族博物館」的心願，一直到國府遷臺、中研院民族所籌備處1955年成立以後，才終於出現曙光。1963年，民族所大樓（現家驊館）完工，凌不僅在該棟建築內規劃陳列室，並曾打算將此大樓命名為「中華民族博物館」：⁴¹

1963……四月，由先生所企劃籌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大樓落成，完成了先生畢生最大心願之一。建築物採中國傳統之宮殿式，全部面積共六百坪，第一層二百二十坪，凡研究室十四間，圖書室二大間，整理室一大間及暗室。第二層二百二十坪，為民族學博物館，共有標本陳列室三人間，第三層閣樓，為標本及圖書儲藏室。先生對民族學博物館之闢建陳列，特別重視，擬議之陳列分三大部分及一特別陳列室：1. 臺灣土著族，2. 中國大陸邊疆民族，3. 太平洋土著族，4. 民族音樂。（宋龍飛 1985c：523）

凌會這麼看重博物館文物、影像收藏，與他在法國受的學科訓練直接相關。從1926年6月凌開始在巴黎大學求學以來，他有三位重要的老師，Marcel Mauss（莫斯）、Marcel Granet（葛蘭耦）和Paul Rivet（黎維）（宋龍飛 1985c：531）。首先Mauss認為在人類學的建制中，博物館與檔案館非常重要：

一九一三年，Mauss……將當時西方各國的人類學發展作一綜合性的評述，並且指出法國人類學落後之處……。他認為，這門學科要迎頭趕上，起碼要有三個機制（institutions）互相配合：……它必須要有一群不管是專業或業餘的民族誌工作者，他們必須到當地親眼做觀察，而且能夠帶回文件和匯集收藏的材料。這些材料一旦匯集起來以後，就輪到博物館和檔案館負責將之整理、展示和發表。最後，不同程度的教學工作應該讓技術人員、學員、甚或一般大眾能夠充份瞭解這門科學。（戴麗娟 2006：636）

41 儘管有幾份材料都提及「中國民族博物館」之規劃，但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這棟大樓曾正式被命名為「中華民族博物館」。

其次，Paul Rivet (1876-1958) 除了是一位體質人類學家和傳播論者外，他還是法國人類學博物館史上一大關鍵人物 (Rival 2010, 戴麗娟 2006)。

這種強調田野和博物館文物收藏的研究取徑，或通過物質文化普及民族學知識的目標，就是凌就讀的巴黎大學民族學中心 (Institut d'ethnologie) 1920年代後期最重要的取向。戴麗娟 (2017) 還告訴我們凌純聲當年在巴黎大學上課地點就在博物館內。戴麗娟 (2006) 認為，博物館對法國人類學建制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英、美人類學在1910-1920年代都已經逐漸脫離博物館而在大學系統中日益茁壯時，博物館在法國人類學的角色不僅不見萎縮，反而在1930年代到達了頂峰。而Mauss主張人類學建制化的三要素——田野調查、博物館/檔案館、教學——都在凌所建立的民族所籌備處逐步實現了，特別是對文物影像的重視和集體的田野考察形式：

深受歷史考據方法影響的Mauss視人類學物件為檔案資料的……。Mauss當時所設想的田野工作模式是以團隊方式進行，甚至是學者與軍隊同步，對於一陌生國度同時進行探勘、記錄和採集……。當時大部份有機會做田野工作者，都被鼓勵在最短的時間內蒐集最多的資料和文物，並且要將這些資料完整地送回法國本土，放在博物館內做系統化的整理和展示，以提供給大部份未能親身到田野觀察的學者做比較研究。(戴麗娟 2006 : 639-640)

上段引言，是出自Mauss學術生涯早期法國人類學／民族學尚未在大學有專科，而仍需要通過博物館和各種學會做推廣的年代。Mauss發言突破之處，在於強調學者親身做田野的重要性並介紹具體可行的田野方法 (Parkin 2005 : 167-169)。受法國人類學訓練的凌深受此影響，因此在他主持民族所的年代，田野、文物影像與標本收藏缺一不可。凌曼立對父親叮囑學生收藏文物影像一事有深刻的印象。她說：

我父親教書，每年都要帶學生做田野調查……。每次去，他就儘量收集那些標本。像……木頭的像啦那些，他看那些人都把它們放在那

邊、墊在地上，做牆啦堆在那邊，……。他們說：「喔，你出錢，我們都賣給你。」……

那時候他們出去都要照相，那個照相機我父親說一定要買好的，然後買回來……叫他們每個人趕快用……，用壞了再去買。我父親說……，我買來是要用的，不是放在那裡給你們看的。……

東西買來可以放，他說幾百年的寶貝（東西），錢是去了還可以要來，這個東西給他們丟掉以後就沒有了。（凌曼立訪問）

訓練學生拍田野影像，收集、整理文物，是凌先生推動民族學及臺灣人類學建制化相當核心的一環。⁴²規劃集體田野考察是另一個工作重點，而參加集體研究計畫的成員，都肩負著收集文物、拍照影像的任務，凌則負責籌措購買及運送標本之經費。石磊在訪談中（2013/10/8），提到他暑假來民族所實習，凌先生就叫他「整理標本、測量標本等半個月」；還提及其所訂定的田野學術倫理：不可以在田野發展任何的男女關係，「所有發現的資料就是所裡的」，在田野期間收到的任何物件、相片，甚至田野筆記都不可以放進個人口袋。正是草創時期這一嚴格學術倫理，才有今日的民族所博物館，並以這批珍貴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及影像檔案，造就今日民族所博物館得與原住民團體進行共作展示的機會（何翠萍 2019）。

許嘉明曾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1991-1994），他格外懷念凌純聲主持博物館的年代以及當時研究人員休戚與共，一起擔負所內各項服務的情景（何翠萍等 2016a、2016b）。他說：凌先生很重視博物館、對博物館很有使命感。籌備處成立之初是在近史所樓上工作，空間不大，但他還是堅持設個陳列標本的櫥窗。等到民族所大樓蓋好之後（1963），特別規劃了一間標本陳列室（1965），交由宋龍飛負責。民族所每年度都會編列買標本的預算，但運送標本很貴，凌也會想辦法找錢解決。許還記得：「宋龍飛負責標本室的時代，

42 任先民（2012）說：他任職民族所期間（1955-1960），主要就是負責所內採購、財務支配，並撰寫田野調查報告。

他每年還會把標本拿出來曬。」⁴³宋龍飛在〈加者勝眼社最後的巡禮〉一文（1985b），敘述他當年與王人英在好茶舊村（加者勝眼社就是現在「好茶」村）一起買到魯凱族350餘件標本的經過；⁴⁴相當程度地還原凌先生帶研究人員和學生採集標本的方式。該文對經費的情況有相當具體的陳述：「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在極其拮据的情況下，（凌）籌措到一筆二萬元經費，這筆經費，在當時的我看來已經是一筆極其龐大的天文數字了，那時我月薪僅有八、九百元」（1985b：356，括號內文字為筆者所加）。民族所博物館現有的臺灣原住民館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件以及所有珍藏黑白田野影像，都出自凌純聲對科學民族誌調查方式的認知以及博物館收藏視角之引導。

民族所大樓及正式的標本陳列室建築終於竣工落成了。除了籌備處時期收藏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外，來臺前採集的邊疆文物以及與國外博物館做交換的文物，也都一一入藏。1961年9月21日凌寫信給張光直，叮囑他在耶魯安排一些博物館文物、標本交換事宜：「耶大與民族所交換標本事，民族所現擬建築研究室及陳列館，在陳列館中設一太平洋室，正想與各博物館交換標本也」（李卉、陳星燦 2005：98-99）。這件事另外在1966年成功辦到了。民族學研究所1965年的年鑑稿也寫道：「民族所標本：本年度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借來凌純聲先生等曾在大陸邊疆各地調查時所採集之土著民族標本一千餘件，現已陳列而供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檔案》，未編號）。

無論「民族學標本」在人類學史上的爭議性有多大，或蔡元培、凌純聲成立「中國民族博物館」的初衷是什麼，這批在籌備處時期基於搶救目的而收藏的臺灣原住民物件與影像，乃至於民間文化的物件，讓本來會被同化或現代化洪流所淹沒的「文化」，找到被重新拼湊起來、延續下去和再創造的可能性（蔣斌、何翠萍 2014；何翠萍、蔣斌 2014；何翠萍 2019；林文玲 2022；見本期林文玲文）。在當前全球化、數位化潮流下文物，標本及影像，更成為民族所普及人類學知識以及發揮公共人類學議題最重要的資產。

43 許嘉明訪談（2015/5/5）。

44 許嘉明（同上引）說：王人英臺語流利、性格外向，常幫凌和工人進行溝通事宜。

（五）民族所正式設所

籌備處運作十年，民族所正式設所。在凌從善如流、海納百川的人類學視野及兼容並蓄的寬容個性領導下，既有的幾個研究方向到了民族所正式成立時，已在因應研究人員個別的興趣與時局的變遷下，有不小的改變。1965年，為了因應正式設所的格局，凌純聲提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擴展研究計畫」。在「研究範圍與研究人員」方面，除了既有的「民族史」和「民族學」外，新加入了「社區社會學」以及包涵民族音樂之「民俗學」，共四組。「民族史」是「以研究中國民族發展史及環太平洋民族接觸關係史為中心」，「民族學」是「研究一般民族學，並著重於大陸邊疆民族與臺灣土著之研究」，「社區社會學」指的是「以社區為中心，著重於實地調查與理論的分析，並以臺灣農村社會與平埔族以及東南亞華僑社會為目前研究對象」，「民俗學」指的是「研究臺灣漢人民俗宗教及中國、太平洋區之民族音樂」。⁴⁵社區社會學是衛惠林、劉斌雄、李亦園的興趣，凌將其納入民族所正式成立以後的新方向；而他自己則為他傳承自法國漢學家Marcel Granet的民俗學興趣成立專組發展，劉枝萬就是凌網羅的民俗學者。必須一提的是，曾任凌多年助理的宋龍飛，日後被認為是推動臺灣現代陶藝最關鍵的人物之一，是在凌的影響下進入民俗研究領域，並著述《民俗藝術探源》。其中，「社祭之源·里社之神—從『福德正神』土地公談起」以及「從民俗中探詢龜祭文化的根」兩篇，即在「闡揚凌純聲老師學術思想」基礎上所寫（宋龍飛 1985a：268）；該書所收錄的〈凌民復先生年表〉更是本文所倚賴甚多的文獻。

凌純聲憑一己之力，成立了籌備處，無私地延攬人才，拓展研究方向，推動研究計畫。為了實現獨立創所以及替人類學科的建制化打下堅實的基礎，他處理所務，辦集刊、專刊、寫稿、校稿；收集文物成立博物館、建大樓。1965年民族所正式成立了，凌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績。⁴⁶但身體也開始走下坡，病痛陸續出現，年近60歲時（1958年下半年）罹患「腎盂炎」，隨後又為高血壓、風濕所苦（李卉、陳星燦 2005：73、95），更飽嚙無人分享學問的寂寞，他在1960年3月12日給張光直的信中寫道：

45 《中央研究院公文檔案》，「本院民族學研究所成立案」，0054-622-01-01-03。

46 詳見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度《中央研究院概況》頁45-49。

近年以來純在此最感悶苦者，學問上無人討論。記得弟曾說過我的靈感多，然有靈感而討論無人，得不到更多的啟發，寫起文來，常感到無十分的信心耳！純與弟雖誼屬師生，然在做學問道上，你是我的第一個知己，近年我年事漸高，精力已不若昔，晚上常常不能工作，白天寫文，亦覺較前遲鈍，且多重複，因不能一氣呵成也。所以常想將初稿校樣，先寄你讀。（2005：86）

雖然身體不適，身邊也沒有學術知己而倍感苦悶，但凌先生仍立下遠大的著述目標。在1970年1月1日寫給張光直的信上說：

我做所長十五年，吃苦耐勞，唯目的是求得出版的自由而已……。我深深覺得人生最值得留念的還是著作……。所長在半年中能交卸後，有生之年，想再出五六本專刊。（2005：109）

1970年3月8日寫給張的信更具體說明：

中研院本聘我再任所長三年，我因年老力衰，不能再任行政工作，暫時維持所務，至遲至六月底為止。現已三月初；再過四月就可以專心做研究工作矣！我計畫（和整理）再有四五本專刊（一）中國古代與大洋洲水運工具；（二）中國與海洋洲的龜祭文化；（三）中國與太平洋的玉石文化；（四）亞洲太平洋美洲的封禪文化；（五）楚、吳、越的海洋文化研究。以後善保體健，不與人相爭，摒棄一切外務，專門著述，以樂餘年。（2005：110-111）

1970年凌卸下所長職務後，專事研究、寫作，仍在考古人類學系擔任教職。寫作一直堅持到74歲（1973）才停筆，但仍舊在家中教研究生課程。之後多次住院療養，1978年7月21日（79歲）「終因腦血管病變與世長辭」（宋龍飛1985c：525、526）。

五、結語

對這麼一位資質過人、勤奮不懈又毅力驚人的學者，除了讀書、寫作、辦公，他還做什麼？我不斷問凌曼立，凌先生來臺後，是否還玩樂器，是否有什麼嗜好？他喝酒消遣或打牌嗎？他看戲、看電影嗎？她說，他只小酌；而打牌這回事，因為他總是贏牌，所以他不打。但是每寫完一篇文章或偶爾賺點外快的時候，他就說：「史禾，我請客，我帶你去看電影！」（凌曼立訪談，2016/11/21）。因為他知道「我媽媽很喜歡看」。

做學問對他來說是唯一最重要的，他根本沒有其他的hobby……。他偶爾吹吹笛子……。臺灣的條件也不可能去買樂器……。他唯一的做的就是做學問，回來就是教學生，在家裡也是寫文章，出去也寫文章。

（凌曼立訪談，2016/11/21）

人家說去遊山玩水，我爸爸遊山玩水的時間，就是去收收資料，問問當地人的生活，他跟其他人不一樣，他從來不會跑到城裡面去，他都要去鄉下，他常常說禮失而求諸於野……。我父親就說你不要帶我去看什麼時髦的東西，時髦的東西我沒有興趣，我去看那種最老最鄉下的事情。（凌曼立訪談，2016/11/17）

他喜歡聽京戲，像從前顧正秋演戲的時候，我爸爸都買票去看……。我爸爸生病的時候，電視才出來，他買了兩部電視……。一個電臺做廣告的時候，他就看另一臺，廣告完了戲繼續演，他也還是要看下去，就兩個一起看。（凌曼立訪談，2016/11/21）

凌先生的音樂興趣，不但在年輕時讓他在不平靜的生活壓力下有了寄託，臨到晚年，他也透過戲曲世界轉移病痛之苦。他的沈穩來自其內斂、務實的性格，更得益於音樂、電影、戲曲的調劑。凌曼立曾說，父親在朋友當中是屬於「軍師」型人物，他會告誡政界朋友不要如此這般做某些事，「如此做事會得罪文化界的人」。傳編的臺大預算卡在省議會，也曾找其父幫忙疏通。「我父親去講，他們就會買他的賬」（凌曼立訪談，2021/7/21）。凌行事謹慎，睿

智、有遠見，因此他的人脈總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從戰時爭取獨立設所這件事，我們看到凌純聲一貫低調、緘默，謹慎行事的風格，但也看到當他所代表的民族學被邊緣化時，失落沮喪的情緒再難隱忍而毅然決然離開研究院轉投教職。到了臺灣，當機會再度出現在眼前，他義不容辭地用他的知識與熱情，替民族學爭取到獨立成所的格局。凌純聲一生，似乎無法僅用內斂、沈穩、謹慎，來全盤理解；他也有情感、情緒和追求理想的執著與熱情。

前文曾提及，凌純聲讀到鹿野忠雄的方法與觀點與自己相似時，無比興奮，特為《臺灣先史學民族學概觀》寫了篇序。序文中，他著述的熱情躍然紙上：

今悉鹿野氏的結論與我相同，人生在做學問之道上，能與人不謀而合得到同一結果，亦一快事！宋文薰同學將原書中有關臺灣最重要的七八九三篇，即臺灣在東南亞先史學上的地位，臺灣土著族分類的一擬案，臺灣土著族的物質文化及其類緣，傾半年的心力譯出，囑為校閱，我窮一日夜之力，一口氣把他讀完。生平讀書，除看偵探小說，從來沒有如此的不忍釋卷。且懷著好像在學生時代，在考試繳卷之後，急欲知道答案的正確與否的心情來讀此書，所以如此引人入勝。我多年來所發現許多重要問題，鹿野氏亦常能見到，例如今年二月間，我在花蓮研究阿美族的羽冠之後，曾對張光直同學說：「此次回去，我可以寫銅鼓花紋一文了。」但鹿野氏已說過，阿美族的扇狀鳥羽頭飾，見於新幾內亞及阿薩姆Nagas諸族，亦提及屬於東山文化的青銅器上，也有這種羽飾。他如關於岩棺、甕棺、獨石、銅器等等的解釋，多少都與筆者類似的觀點。（凌純聲 1979c[1953]：1697，黑體為筆者所加）⁴⁷

多麼動人的著述熱情！這與凌予人內斂、低調、務實、謹言慎行的印象截然不同。

47 深入比對凌與鹿野忠雄（2016）著作，或凌與其他日治時期做先史學研究學者的著作，即可讀出凌觀點的原創性（亦見張光直 1968, 1995）。

抗戰時期，當邊疆研究被當局、學界視為顯學之際，朱家驊院長馬上想到民族學與凌可以扮演的角色；當政府出於政治考量，希望對新疆進行更深入、嚴謹的研究，凌和民族學也是馬上被考慮的人選和優先衡量的學科知識。來臺後，當傅斯年校長琢磨著要在臺大設立考古人類學系時，馬上想到的也是凌在地理學與民族學知識上的廣博。儘管凌一再被視為是關鍵學科的不二人選，但他所代表的民族學卻一直只能依附在別的學科之下而難以獨立。直到來臺，民族學及凌的知識終能對臺灣、臺灣人以及包含原住民在內的臺灣文化提出突破性說法，獨立成所的合理性終獲正視。而凌也終能振振有詞地、堅定地從人才培養、設立博物館、興建硬體大樓、創辦刊物和恢復學會等層面，建立民族所和人類學科的獨立性。凌個人也更透過他的著作，用他永不熄滅的著述熱情，為臺灣在中國文明／文化、在跨區域、乃至於全世界找到定位。

李亦園在慶祝凌70歲的特刊（1970：1）中，闡述凌純聲對中國民族學的貢獻：「四十年來，凌先生努力於民族學研究工作之提倡與推進，尤其是民國四十四年民族所開始籌備之後，先生對研究計畫之釐定以及對後進之提攜不遺餘力，而本院民族學之研究得以立下不拔之基礎。然而先生對中國民族學之貢獻，並不僅在於領導研究機構與訓練年輕學人，最重要的仍在與學術研究上的開拓與創見」。這樣的學術格局，若說是來自一位內斂、謹慎的學者之手，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但當我們看到他的著述熱情與靈感光芒時，我們這才明白支持凌不屈不撓、奮力不懈的，正是那讓他得以盡情發揮的創造力和想像力。

凌純聲出生自一個平凡卻又非凡的家庭，他有幸福的童年與母親的嚴格家教；母親還為他選了一個陪伴他一生的伴侶。嚴格的家教形塑他內斂、務實而謹言慎行的行事風格。他本身資質過人，單憑自修自學，就為自己創造了去法國留學之路；而音樂才華也讓他找到吹彈樂器、表演和欣賞戲曲的嗜好。由於專注務實，他成功拿到博士學位，為自己鋪上中研院的學術研究之路。憑著過人的資質、勤奮與毅力，凌先生不但著作等身，還成功創立了中研院民族所。學術政治似乎是一個讓他不斷需要婉轉應對與妥協的世界，但憑著對民族學知識追求的熱情和信念，凌純聲發揮了個人最堅毅的意志，以一己之力建立了民族所，奠定臺灣人類學科建制化的最堅實基礎。



1969年前後凌純聲先生攝於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前（來源：凌曼立捐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授權）⁴⁸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 編

- 1947 中央研究院史綱，大事記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A Chronology of Events]。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ash.ascdc.sinica.edu.tw/history-by-year.php?y=1947>, 2021年8月30日 [August 30, 2021]。
- 1965 中央研究院概況（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度）[Overview of Academia Sinica (1965)]。臺北：中央研究院 [Taipei: Academia Sinica]。

中國民族學報編輯委員會

- 1955 發刊詞 [Forward]。中國民族學報 [Bulletin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 i-ii。

48 筆者推測此影像係攝於1969年前後。相片背後雖寫有「民國四十八年創辦民族學研究所時攝以留念」字樣，但應為旁人所寫。民族所大樓1963年才蓋好，而凌曼立也說照片背後文字並非凌先生字跡。筆者比較其他凌先生影像，認為貌似1969年所攝面容，因此推測此年份。

王聿均

- 1985 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 [Mr. Chu, Jia-hua and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刊於[In]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 [Walking through the Years of Storms: The Story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陳三井主編 [Chen, San-jing, ed.]，頁192-232 [pp. 192-23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 主編

- 2011 傅斯年遺札 [Letters of Fu, Ssu-nien] (第三卷) [Vol. 3]。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王明珂

- 2010 20世紀上半葉的邊疆民族考察與“邊疆民族”概念：以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為例 [The Concept of “Frontier Peoples”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Frontier Peoples Stud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Researcher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刊於[In]東アジア近代における概念と知の再編成 Higashiajia kindai ni okeru gainen to chi no saihensei [The Reformulation of Concepts and Intellectual Systems in Modern East Asia] 35: 279-291。

任先民

- 2012 中央研究院與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 [Academia Sinica and My Research on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發現（史前館電子報）[Discovery (digital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236: 1-5。

吳燕和

- 2006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 [Hometown, Fieldwork and Train: an Anthropologist's Trilogy]。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宋文薰 節譯

- 1955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An Overview of Taiw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he Taiwan Province General Chronicle Committee]。

宋龍飛

- 1985a 民俗藝術探源（下）[Search for the Roots of Chinese Folk Arts, 2nd Part]。臺北：藝術家出版社[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
- 1985b 加者勝眼社最後的巡禮。刊於[In]民俗藝術探源（下）[Search for the Roots of Chinese Folk Arts, 2nd Part]，宋龍飛 [Song, Long-fei]，頁364-394 [pp. 364-394]。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
- 1985c [1982] 凌民復先生年表（1900-1978）[Chronology of Dr. Ling, Min-fu (1900-1978)]。刊於[In]民俗藝術探源（下）[Search for the Roots of

Chinese Folk Arts, 2nd Part], 宋龍飛 [Song, Long-fei], 頁530-541 [pp. 530-541]。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

李卉、陳星燦 編

- 2005 傳薪有斯人：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Chi Li, Shun-sheng Ling, Ch'u-hsun Kao, Nai Hsia and K. C. Chang]。北京：三聯書店 [Peking: Joint Publishing]。

李亦園

- 1970 凌純聲先生對中國民族學之貢獻 [Professor Ling, Shun-sheng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Ethnology]。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IOE] 29: 1-10。
- 1998 凌純聲先生的民族學 [The Ethnology of Mr. Ling, Shun-sheng]。刊於[In]新學術之路：史語所七十週年論文集 [Along New Pathways of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 [Du, Zheng-sheng and Fan-sen Wang, eds], 頁737-745 [pp. 737-745]。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翠萍

- 1999 從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幾個個案談「己」與「異己」的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Discussed from Several Cases of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of China]。刊於[In]人類學在臺灣：回顧與展望篇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aiwan. Retrospect & Prospect], 徐正光、黃應貴編 [Xu, Zheng-guang and Ying-gui Huang, eds.], 頁357-404 [pp. 357-40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9 相認：記第一次共作展示案 [Acknowledging: The Memory of the First Collaborative Exhibition]，刊於[In]《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Collaboration: Remembering a Tribal Exhibition of Old Atayal Objects], 何翠萍、尤瑪·達陸編 [Ho, Ts'ui-p'ing and Yuma Taru, eds.], 頁10-39 [pp. 10-3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20 20世紀30年代中國景頗族影像的由來與本書 [Sources of the Chinese Jingpo Photographs in the 1930s and this Book]，刊於[In]20世紀30年代中國景頗族影像誌 [Chinese Jingpo Photographs in the Thir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Comments], 金黎燕、何翠萍編著 [Jin, Li-yan and Ts'ui-p'ing Ho, authors and compilers], 頁1-72 [pp. 1-72]。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Press]。
- 出版中[In press] 凌純聲的人類學旅程－從松花江到太平洋 [Ling, Shun-sheng's Anthropological Journey: From the Sungari River to the Pacific

Ocean]。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翠萍 策展

- 2017 從松花江到太平洋的人類學旅程——凌純聲先生紀念展 [An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Dr. Ling, Shun-sheng and His Anthropological Journe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常設展 [Long-term Exhibition,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2017年1月16日開展 (launched on January 16, 2017)。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NewsReview/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31412251&MenuID=530210530623576651&SSize=10&Fid=0&View=1&MSID=2012112816304433649。

何翠萍、曾瓊瑩、許善惠、楊雯娟

- 2016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發展史）[The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刊於[In]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60年發展特輯 [Special Volume on the 60-year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 [Hu, Tai-li, Shun-de Yu and Yu-hui Zhou, eds.], 頁165-180 [pp. 165-18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2016b 民族所博物館大事記（1955-2015）[Chronicle of Events of the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1955-2015]。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Messages/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31412251&MenuID=530164225744434404&FID, 2021年10月31日 [Oct. 31, 2021]。

何翠萍、黃宛瑜、楊雯娟 策展

- 2012 二零年代中國南方邊疆民族典藏展 [Archival Exhibition of China's Southern Frontiers in the 1930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常設展 [Long-term Exhibition,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2012年4月17日開展 [launched on April 17, 2012]。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NewsReview/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4225631412251&MenuID=530210530623576651&SSize=10&Fid=0&View=1&MSID=2012112816275830546。

何翠萍、蔣斌

- 2014 展示一段人類學的歷史 [Exhibiting An Era of History in Anthropology]。人類學視界 [Introduction to the Taiwan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16: 14-19。

周文玖、張錦鵬

- 2007 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Only One Chinese Nation"]。民族研究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7(3): 20-30。
- 林美容
- 2020 林美容教授序 [Lin, Mei-rong Preface]。刊於[In]道教復興與當代社會生活：劉枝萬先生紀念論文集 [Taoist Reviv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Memorial to Liu, Chi-Wan]，丁仁傑主編 [Ding, Ren-jie, ed.]，頁 v-viii [pp.v-vii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林文玲
- 2022 持續延展的生命傳記：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50至196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田野照片」[An Ever-Extending Biography: "Field Photo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i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1): 115-166。
- 胡其瑞
- 20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蒐藏意義試析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ollection of Chinese Ethnic Artifacts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古今論衡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35: 95-124。
- 凌純聲
-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下冊）[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Nanj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1936 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 [Methods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民族學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Ethnology] 1: 1-54。
- 1950 記本校二銅鼓兼論銅鼓的起源及其分佈 [On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the Bronze Drums]。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1: 9-62。
- 1979a[1950] 東南亞古代文化研究發凡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on Ancient Cultures of Southeast Asia]。刊於[In]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Studi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and Circum-pacific Culture, part 1]，凌純聲著 [Ling, Chun-sheng]，頁329-334 [pp. 329-334]。臺北：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 1979b[1952] 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 [The Ancient Min-yue Peoples and Taiwan Native Peoples]。刊於[In]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Studi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and Circum-pacific Culture, part 1]，凌純聲著 [Ling, Chun-sheng]，頁363-388 [pp. 363-388]。臺北：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 1979c [1953] 臺灣先史學民族學概觀序 [Preface to the Overview of Taiwan Prehistory and Ethnology]. 刊於[In]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 (下) [Studi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and Circum-pacific Culture], 凌純聲著 [Ling, Chun-sheng], 頁1697-1700 [pp. 1697-1700]. 臺北: 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 1979d [1954] 中國古代海洋文化與亞洲地中海 [Ocean Cultures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Asian Mediterranean"]. 刊於[In]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 (上) [Studies of Chinese Minorities and Circum-pacific Culture], 凌純聲著 [Ling, Chun-sheng], 頁335-344 [pp. 335-344]. 臺北: 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 1960 國殤禮魂與馘首祭梟 [Kuo Shang and Li Hun of the Nine Songs and the Ceremonies of Head-hunting and its Feast].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 411-461.
- 2005 凌純聲致張光直 (1955-1971) [Ling, Shun-sheng Letters to K.C. Chang, 1955-1971]. 刊於[In]李卉、陳星燦編, 傳薪有斯人: 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Ch Li, Shun-sheng Ling, Ch'u-hsun Kao, Nai Hsia and K. C. Chang], 李卉、陳星燦編 [Li, Hui and Xing-can Chen, eds.], 頁49-113 [pp. 49-113]. 北京: 三聯書店 [Peking: Joint Publishing].

凌純聲、童之弦

- 1928 霓裳羽衣 [Raiment of Rainbows and Feathers]. 上海: 商務印書館 [Shanghai: the Commerce Press].

凌希立

- 年代不詳 [n.d.] 凌家的女強人一憶祖母凌岳氏 [A Strong Woman of the Ling Family--Remembering My Grandmother Madam Ling Yue]. 手稿 [manuscript]. 未出版 [unpublished].

高去尋

- 2005 高去尋致張光直 (1955-1961) [Letters from Kao Ch'u-hsun to K.C. Chang (1955-1961)]. 刊於[In]李卉、陳星燦編, 傳薪有斯人: 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Chi Li, Shun-sheng Ling, Ch'u-hsun Kao, Nai Hsia and K. C. Chang], 李卉、陳星燦編 [Li, Hui and Xing-can Chen, eds.], 頁117-167 [pp. 117-167]. 北京: 三聯書店 [Peking: Joint Publishing].

陳星燦

- 2005 前言 [Introduction]. 刊於[In]傳薪有斯人: 李濟、凌純聲、高去尋、夏鼐與張光直通信集 [A Collection of Letters Between Chi Li, Shun-sheng Ling, Ch'u-hsun Kao, Nai Hsia and K. C. Chang], 李卉、陳星燦

編 [Li, Hui and Xing-can Chen, eds.], 頁1-4 [pp. 1-4]。北京：三聯書店 [Peking: Joint Publishing]。

張光直

1968 序 [Introduction]。刊於[In]美國東南與中國華東的丘墩文化美國東南與中國華東的丘墩文化 [The Mound Cultures of East and Southeastern China]。凌純聲著 [Ling, Chun-sheng], 頁xx [p. xx]。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5 懷憶民族學前輩學者凌純聲教授 [Remembering Our Predecessor Professor Ling, Shun-sheng]。刊於[In]考古人類學隨筆 [Informal Essays on Archeology], 頁 122-123 [pp. 122-123]。臺北：聯經出版社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張朋園、陳三井、陳存恭、林泉

1987 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Kuo, Ting-ye]。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鹿野忠雄 Kano, Tadao

2016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Studies of Ethnology and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楊南郡、李作婷 譯註 [Nan-jun Yang and Zuo-ting Li, trans. & noted.]. 臺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Taipei: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

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

年代不詳 [n.d.] 國立中央博物館籌備處概況 [Overview of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Museum]。未出版 [Unpublished]。

莊本立

1963 中國古代的排簫 [Panpipes of Ancient China]。中央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第四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No. 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散木

2001a 巴金的山西摯友—衛惠林（一） [Ba, Jin's Dear Friend from Shan-xi, Wei, Hui-lin, number 1]。博覽群書 [Extensive Reading] 8: 49-51。

2001b 巴金的山西摯友—衛惠林（二） [Ba, Jin's Dear Friend from Shan-xi, Wei, Hui-lin, number 2]。博覽群書 [Extensive Reading] 9: 58-60。

2001c 巴金的山西摯友—衛惠林（三） [Ba, Jin's Dear Friend from Shan-xi, Wei, Hui-lin, number 3]。博覽群書 [Extensive Reading] 10: 46-49。

黃麗安

2010 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 [Zhu, Jiahua and Academia Sinica]。臺北：國史館 [Taipei: Academic Historica]。

楊樹人

- 1963[1958] 中央研究院最近的十年 [The Past Ten Years of Academia Sinica]。刊於[In]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 [In Memory of Mr. Chu, Jia-hua at His Funeral], 朱家驊先生治喪委員會編 [The Funeral Committee for Mr. Chu, Jia-hua, ed.], 頁325-345 [pp. 325-345]。臺北：文海出版社 [Taipei: Wenhai Press]。

蔡元培

- 1962[1926] 說民族學 [Talking about Ethnology]。刊於[In]蔡元培民族學論著 [Cai, Yuan-pei Treatise on Ethnology], 中國民族學會編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thnological Studies, ed.], 頁1-11 [pp. 1-11]。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 Co.]。

蔡元培先生演講，楊炳勛國音速記

- 1962[1930] 社會學與民族學 [Sociology and Ethnology]，刊於[In]蔡元培民族學論著 [Cai, Yuan-pei's Treatise on Ethnology], 中國民族學會編 [Association of Chinese Ethnological Studies, ed.], 頁12-16 [pp. 12-16]。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Taipei: Taiwan Chung Hwa Book Co.]。

蔣斌、何翠萍 策展

- 2014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1950s-1970s 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研究 [Sparks of Pluralism in an Authoritarian Era: Anthropologists and Indigenous Studies in Taiwan from 1950s to 1970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博物館特展 [Special Exhibition, Museum of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2014年4月23日-2015年6月30日 [April 23, 2014-June 30, 2015]。線上展示網址 [Exhibition Online], <http://sparks.ioe.sinica.edu.tw>。

衛紀慰 Wei, Ji-wei

- 1996 臺灣著名社會學家 [A Famous Sociologist from Taiwan]。山西文史資料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Shan Xi] 1996(8): 35-48。

蕭梅 Xiao, Mei

- 2003 不該忘卻的里程碑——《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A Milestone Tha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中國音樂 [Chinese Music] 4: 23-25。

戴麗娟

- 2006 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兼論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及實證人類學之建立 [The Museum Age of French Anthrop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ical Obje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itivist Anthropolog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77(4): 627-694。
- 2017 重訪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 [Revisiting the Museum Age of French Anthropolog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演講 [Speech given at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2017年1月16日 [January 16, 2017]。

譚旦昉

- 1960 中央博物館二十五年之經過 [Twenty Five Years' Passage of the Central Museum]。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Taipei: Chung Hwa Book Series Committee]。

蘇維新

- 2017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為例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m: Focus on Ting-yee Kuo, Yu-chun Wang, Chia-mo Huang and Yu-shu Lee]。政大史粹 [Collectanea of History NCCU] 31: 121-174。

Granet, Marcel 葛蘭言

- 2005 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 [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 趙丙祥、張宏明譯 [Zhao, Bing-xiang and Hong-ming Zhang, trans.]。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vrich, Paul and Huilin Wei

- 1995 H. L. Wei. *In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aul Avrich, ed. Pp. 407-40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Barth, Frederik,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and Sydel Silverman

- 2005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The Hall Lectures*.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kin, Robert

- 2005 The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In One Discipline, Four Ways: British, German, French,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 Frederik Barth, Andre Gingrich, Robert Parkin, and Sydel Silverman, eds. Pp.155-253.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val, Laura

- 2010 What Sort of Anthropologist Was Paul Rivet? *In Out of the Study, into the Field: Ethnograph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ench Anthropology*. Robert Parkin and Anne de Sales, eds. Pp. 164-204. Oxford: Berghahn Books.

附錄

檔案資料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檔案》[Archives of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收藏（內部資料）[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nternal usage only)]。

《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大陸時期總辦事處）》[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General Office)]。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館藏 [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rchive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公文檔案》[Official Documents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收藏 [Collect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Academia Sinica]。

《胡適檔案資料庫》[Data Base of Hu, Shi Archives]。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收藏 [Collections of Hu, Shi Memorial Hall,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傳圖整編史語所檔案》[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compiled by Fu, Ssu-nien librar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 [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訪問稿

石磊

2013/10/08 訪員 [interviewers]：蔣斌、何翠萍、喬宗忞、楊雯娟、許善惠 [Chiang, Bien, Ts'ui-p'ing Ho, Zong-min Qiao, Wen-juan Yang, Shan-hui Hsu]

吳燕和

2012/05/24 訪員 [interviewers]：黃啟瑞、許善惠、楊雯娟 [Huang, Qi-ru, Shan-hui Xu, Wen-juan Yang]

2016/04/11 訪員 [interviewers]：何翠萍、許善惠、楊雯娟 [Ho, Ts'ui-p'ing, Shan-hui Xu, Wen-juan Yang]

宋龍生

2020/01/17 訪員 [interviewers]：劉斐玟、郭佩宜、楊雯娟、許善惠 [Liu, Fei-wen, Pei-yi Guo, Wen-juan Yang, Shan-hui Hsu]

凌曼立

2016/11/16 訪員 [interviewer]：何翠萍 [Ho, Ts'ui-p'ing]

2016/11/17 訪員 [interviewer]：何翠萍 [Ho, Ts'ui-p'ing]

2016/11/21 訪員 [interviewer]：何翠萍 [Ho, Ts'ui-p'ing]

2021/7/21 訪員 [interviewer] : 何翠萍 [Ho, Ts'ui-p'ing]
許嘉明

2015/05/05 訪員 [interviewers] : 何翠萍、楊雯娟、許善惠 [Ho, Ts'ui-p'ing,
Wen-juan Yang, Shan-hui Hsu]

Dr. Ling, Shun-sheng (Ling, Chun-sheng)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Ho Ts'ui-p'i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retired),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biography of Dr. Ling, Chun-sheng, focusing on his family, colorful talent,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s before and after 1949,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his time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oles played by two women in his life: his mother, Madame Yue, and his wife, Shi Zhe, whose contributions were crucial to his success. Beginning in 1926, Dr. Ling studied at the Institut de'ethnologie, University of Par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cel Mauss, Marcel Granet, and Paul Rivet, earning his doctorate in 1929. This period, referred to by Dai Li-juan (2006) as "the museum age of French anthropology," was formative for Dr. Ling. After returning from France, he joined the ethnology,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team established by Academia Sinica's founding father, Cai Yuan-pei, along with archaeologist Li Ji (Li Chi) and historian Fu Si-nian (Fu Ssu-nian). Dr. Ling began his career conducting ethnographic surveys along the Chinese borderlands. These ethnographic surveys were preceded by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s using an ethnological approach that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Mauss and Granet.

Dr. Ling's later work led to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in 1955,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nthropology's institutionaliz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Institute not only realized Cai Yuan-pei's vision of ethnology and a Chinese ethnological museum but also embodied Dr. Ling's commitment to achieving epistemological clarity in ethnolog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history. Hi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series "Ancient China

and Circum-Pacific Cultures,” which integrates archaeology, history, museum studies, folklore,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Dr. Ling’s ethnographic surveys before 1949 in China and his work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afterward remain a valuable legacy for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anthropology.

In addition to Dr. Ling’s own publications and his extensive correspondence with C. K. Chang, this essay draws from four primary sources. First, it includes a substantial collection of official documen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Hu Shi Archives. Second, it utilizes Dr. Ling’s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with his fieldwork research teams, including exchanges with other scholars. This correspondence is now digitized in databases. Third, it incorporates interviews with Dr. Ling’s former students and associates regarding fieldwork and museum collections. Fourth, it relies on interviews with Dr. Ling’s daughter, Ling, Manli (Ms. Mary Ling Chen). The overall picture emerging from these sources depicts Dr. Ling as reserved yet pragmatic and cautious in his actions, while also being passionate, creative, and notably persistent in his efforts to establish ethnolog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from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Together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Dr. Ling laid the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groundwork for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in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both in Taiwan and globally.

Keywords: Shun-sheng Li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thropology in Taiwan, ethnology, academic institutionalization
